

临沂市在山东省的位置

临沂市政区地名图

#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全国文明城市
- 东夷文化发祥地
-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中国市场名城
- 中国地热城
- 中国书法名城
- 国家园林城市
-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国家卫生城市

图例

- 市政府
- 县(市、区)政府
- 乡、镇(街办)
- 铁路
- 高速公路及道号
- 国道及道号
- 省道
- 县道
- 省界
- 设区市界
- 县(市、区)界



2013·01, 1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李克彬 秦鸿伟  
何相军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王培栋 刘兆东  
李凤军 王泽远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王瑞柱 伊永航  
于 芹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 目 录

## 【本期特载】

谭震林沂蒙二三事 本 编 04

## 【峥嵘岁月】

“铁道游击队”离开铁道后 胡卓然 07

在沂蒙战斗过的“隐形将军”——

韩练成传奇 韩 兢 11

忆南下 尹作让 14

抗战八年的滨海区和滨海八路军（下）万里云执笔 19

## 【名人素描】

闵子宰费考实 平 凡 24

封面人物——诸葛亮 唐士文 30

## 【文化掇英】

溯流探源说“求鱼”

——从“王祥剖冰”到“卧冰求鲤”嬗变的轨迹考察 张铁民 32

抗大与沂蒙根据地的冬学 刘中堂 38

##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40

## 【蒙山沂水】

我国现存最早的墓碑——平邑鹿孝禹碑 林清伟 45



## 【探索发现】

- 孝悌临沂——《二十四孝》探源之七 大荒堂主 47
- 琅邪紫金砚的再发现 徐淑彬 徐 宁 51

## 【诗画赏析】

-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续五） 李兴河 55

## 【影像沂蒙】

- 临沂阻击战 高雷整理 62

## 【史料辑存】

- 解放军70个军的番号由来（下） 叶青松 64

## 【百家渊流】

- 姓氏百家漫谈——陈姓（下） 赵丹峰 68

## 【沂蒙名医】

- 佩锁链的手术刀  
——王国新印象 惠东波 73

## 【沂蒙乡亲】

- 沂蒙山飞出的“九凤”——卢卓婕 高雪萍 77

## 【史志动态】

80

封面：临沂人民广场雕塑：文韬武略之诸葛亮

封底：书法/胡石



## 本刊声明

凡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均视为双方自动接受如下约定：

1、本刊刊载的文字、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稿不查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两个月未采用者可另作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作者文责自负，若侵犯他人权益，本刊概不承担连带责任。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即拥有在“临沂市情网”和本刊主办单位编印的出版物及资料上转载的权利。

# 谭震林沂蒙二三事

本 编



谭震林（1902—1983），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内线兵团（又称东线兵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治委员等职。他长期在山东工作，参与指挥了莱芜、孟良崮、潍县、济南等许多重大战役，是淮海战役五名总前委之一。

## 一、鱼水情深

孟良崮战役前，陈毅、粟裕指挥华野部队于2月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歼灭战——莱芜战役后，撤至张店、淄川一带休整。1947年4月初，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南下沂蒙山区，部队自带干粮，秘密行动。开始指挥部设在沂源东里店，因被我俘虏的敌军第五军一个排长逃回敌部告了密，3天后指挥部即遭敌机轰炸。此后，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华野领导选择了西王庄作为指挥部，那里背靠险峻的沂山西南角。指挥部作战室即设在村西的小学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首长住在村东南的老百姓家里。就是在西王庄，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从1947年5月4日至17日陈毅将军收到了毛主席亲拟和签发的8封电报）同华野陈粟谭等首长的正确领导相结合，孕育出了震惊中外的孟良崮战役的作战方针。解放战争中的沂蒙决战，系大兵团作战，我华野和地方部队30万人投入战斗。它的后勤保障仅莱芜一役，山东各地就投入了62万支前民兵民工，其中有100多个子弟兵团。由此可知人民群众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孟良崮战役决战时，为了更好地了解敌我态势和便于指挥，陈、粟、谭的前线指挥部移到王庄西南的一个山洞里。山洞长年滴水不断，潮湿阴冷。跟随着首长的何良才和周秀成同志准备去村里借几块门板，给首长铺床。粟裕知道后制止说：“门是老乡守家的，你们把它借来，他们怎么关门呢！买点高粱秆子（秫秸），把它铺在沙子上就行了。”

（刘家昌）





## 二、知人善任

敌整编七十四师的被歼，标志着华东战局的转变开始。

在制定围歼七十四师的计划时，华野首长最早只是把一纵作为总部预备队，以留作关键时候使用。在召开作战会议时，一纵司令员叶飞甚至没有到会，而由两位副手何克希和谭启龙去听会。

哪知，会议进行到中间，在考虑使用哪支部队来担负穿插任务时，一纵这道菜却被端了出来。

围歼七十四师，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先把它与二十五师分割开来，而分割七十四师的这支部队，一面要顶住七十四师的反扑，一面还要挡住敌其他部队的增援。如此险重的任务，若不是由一支敢拚敢打、经验丰富的部队来完成，那是让人十分不踏实的事情。

大家正在沉思之中，突然谭震林提出：能否使用一纵？

谭震林的话，使陈毅和粟裕眉头顿展。

“合适得很嘛！”陈毅笑道：“一纵是穿插老手，担任这样的任务，可以放心！”

参加会议的一纵副政委谭启龙和副司令员何克希二人表态受领了这一任务，但二人又都觉得原部署中没有一纵，战前准备不足，需回去商量。

“这样吧”，陈毅把一支抽剩的烟头熄灭，然后以一种理解的口气对他俩说道，“你们俩现在就返回纵队，去向叶飞同志汇报，然后让他马上到总部来一下”。

叶飞听罢谭、何二人的汇报，立即飞马直奔西王庄，当他汗淋淋地来到华野指挥部时，陈、粟、谭三人都正在等着他。

“哈哈，你这个‘梅兰芳’不上台，这个戏不好开场嘞！”亲口点了叶飞将的谭震林一见到叶飞，便开口笑道。叶飞向三位首长行了礼：“报告首长，叶飞来迟了。”

“不，不迟”，陈毅望着自己的老部下也笑道，“我这半包香烟还没抽完嘛，哈哈”。

简短的交谈后，粟裕把叶飞叫到作战地图前，向他交待了一纵的任务：“叶飞同志，



1946年（左起）饶漱石、陈毅、谭震林、刘瑞龙、粟裕在临沂

任务你大概已经清楚了。这次，你纵作为右翼迂回攻击部队，主力由旧寨以西楔入，割裂敌七十四师与敌二十五师的联系。尔后，配合友邻部队，来共同围歼七十四师。我们之所以动用了你纵，是因为你纵在楔敌纵深、穿插分割和断敌退路方面，老练而有经验，值得信赖。回去之后，望尽快做好动员和准备，并尽快将行动方案制定出来。”

陈毅把手放在叶飞肩上：“任务的确很重，但无论如何，你们也要完成！晓得啵？如果一纵不能保证于明天拂晓割裂七十四师与它左翼的联系，那么整个战役意图就要泡汤了。我们已经把独立师加强给你们，这样你就有4个师了。叶飞，好好打！这一仗，关系到我们华野的前程命运啊！”

叶飞没有辜负华野首长的期望，率部将敌七十四师死死钉在了孟良崮上。（小林爱）

### 三、高风亮节

“谭老板”（当时人们对华野东线兵团政委谭震林的俗称）对批评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曾说：“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能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这是“谭老板”的经验之谈。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且看“谭老板”如何表现——昌潍战役打响以后，为配合作战，政治机关起草了《昌潍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和一个瓦解敌军的电报。起草和发出文件的用意自然是很好的，想尽快让昌潍的敌人投降。可问题就出在这后一份电报上。这份电报主要是讲对敌方人员的宽大政策，提出该地区的国民党党政军各类人员一律“既往不咎”，立功可以受奖等……电报发出时，兵团政治部还把这个内容印成了传单，在下边纵队开展了对敌广播。随着电波，这个消息被传了很远很远。消息传到中央大本营，第二天就有了反映。一份措词严厉的批评电报，传到了兵团机要室。

电报明确指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首恶者必办”规定的，……最终将是一种欺骗！兵团政治部接到电报之后，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这是中央明令批评——这种事情在华野东线兵团是很少见的。大家很快想到了要“追究”责任——战争年代是很讲责任的。一个命令，一个电报的差错，往往就会造成多少人的牺牲。因此权力和责任是紧密相联的。中央要“追究责任”的消息传出后，政治部门的一些同志心情十分沉重。

由于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儿在兵团来说算件大事，因而只要一开会就会提到它。这天，兵团各部门的首长都在场，大家沉默了一阵又提起了这份电报。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说：“电文是我们政治部起草的，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最终将是一种欺骗’，我们犯了错误，要向中央检讨。”

“谭老板”此时站了起来，摆摆手说：“你们检讨什么？电文是经我签发的，由我个人向中央作检讨，不要你们负责。”此时的“谭老板”是华野副政委兼东线兵团的政治委员，他说此话时的语气是平缓的，也是沉重的。有人说：“这事儿不该谭政委写检讨，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谭老板”说：“我签发的，就是我的责任。”

此时人们还不知道，谭震林已经给中央写了检讨，电报早已摆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他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没有一句责怪下面的话。更没有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这件事，使谢有法等同志对“谭老板”肃然起敬。人们说：“多亏了谭政委，要不，我们可是吃不，得兜着走了。”（志伟）

# “铁道游击队”离开铁道后

胡卓然



鲁南铁道大队

## 两次取消番号

抗战胜利后，鲁南铁道大队集体“转业”。1946年2月，鲁南铁道大队番号被撤销，在原大队的基础上成立“鲁南铁路局”，承担鲁南地区的铁路交通工作。原大队长刘金山担任副局长。

同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区的铁路生产被迫中断。鲁南铁路管理局的任务不再是“修路”、“护路”，而不得不变成“破路”：这个夏季，他们动员铁路工人、民兵及群众，把山东南部的津浦铁路的很多路段挖得“片铁不留”。

8月底，鲁南军区调集原鲁南铁道大队部分骨干，重新组建鲁南铁道大队。刘金山再次出任大队长。刚刚在地方工作半年的刘金山，重又回到军队。从此，刘金山的军人身份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离职休养。

此时，进攻山东解放区的马励武国民党整编26师，企图从徐州渡过运河，直插峄县和临沂。重装上阵的鲁南铁道大队，随即开赴京杭运河南岸的贾汪地区，阻滞、袭扰国民党整编26师一部。

抗日战争中，“铁道游击队”只在微山湖的微山岛上进行过一次阵地战，其他全都是游击作



战。现在突然被安排进行阵地阻击作战，战士们都没有修工事的习惯，队伍一下子难以适应过来。但经过动员以及战斗磨炼，他们在运河南岸一带顽强地战斗一个月，胜利完成了阻滞、袭扰任务。之后，他们又转战鲁南地区的津浦铁路沿线、滕县南部、枣庄周围地区等，配合主力部队打击和袭扰敌军，为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等作出了贡献。

到了11月，鲁南铁道大队番号再次被取消，部队与枣庄工人支队合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刘金山在特务团担任副团长，鲁南铁道大队第一任政委杜季伟担任团政委。从此，“铁道游击队”的血脉融进这个团。

1947年1月，鲁南军区特务团与另11个团一起组成右路纵队，参加鲁南战役，围歼了国民党军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随后，在2月的莱芜战役中，特务团与军区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向敌侧后进攻，破坏鲁南的交通线，袭扰、牵制鲁南的国民党军，有力地支援了战役。

## 主攻团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早在4日，鲁中南纵队接华野“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后，即研究确定了攻打山东郯城战斗的具体战斗部署，并确定由47师担任主攻。而47师的主攻团，正是刘金山担任副团长的139团。

139团以1营为突击营，迅速接近郯城东门。结果发现东南角的城墙较低，地形隐蔽，便于登城，且敌人防守兵力也较少，便改为以此处为突破口。他们佯攻东门，以吸引敌注意力，同时以1连为突击连，于当夜2时在东南角攀墙成功。经过激战，1连很快打开东门，刘金山与139团后续梯队及47师其他部队，随即通过东门投入城内巷战。激战至天明，歼灭郯城守军山东保安第1旅。这是“铁道游击队”“升级”到野战部队后的第一仗。

1949年2月，鲁中南纵队与吴化文起义部队合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属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建制，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47师139团改编为35军103师307团，刘金山继续担任副团长，负责作战指挥。



解放军35军攻占南京伪总统府

2月28日，35军接到南下的命令。当天，部队乘坐“闷罐火车”沿津浦线南下到安徽固镇，然后从固镇徒步向南进发，于3月11日到安徽滁县（今滁州市），接替34军（军长何基沣）驻防，34军开赴六合、仪征等沿江前线。307团驻扎在南京北郊江浦的汤泉北边一带。据刘金山回忆，渡江前夕主要有两项任务，即训练战士划船、游泳和寻找渡江船只及船工。但由于江边的部队多，很难搜集到木船，训练有困难，只能向老乡借大木盆代替。

渡江战役中，103师的任务是解放南京江北门户——江浦县城（今南京浦口区江浦街道）。战斗中，307团再次成为主攻团。驻守江浦的是国民党军28军52师154团（另1个加强连）和江浦县保安大队。28军是国民党末期最精锐部队之一，“兵员充足，而且老兵多，在以往战斗中一直表现顽固，因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倚重”。4月20日晚9点，307团向江浦县城发起进攻。激战中，主攻连7次攻城都未成功，140多人仅剩16人，但依然浴血奋战，最后在兄弟连队支援下最先攻进江浦城，战后获得“捷足先登”锦旗一面。带领主攻连的副营长孟庆有，淮海战役中一只胳膊负伤，依然冲到城墙根下，扶起云梯带领突击队登城墙。这次战斗中，他的另一只胳膊也因伤致残。激战至次日6时，守敌被歼灭一部，余部朝着浦口逃窜。

解放江浦县城是35军解放南京过程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战斗，为35军随后进军南京扫平了道路。但彻夜战斗后，307团仅仅休息了1个多小时，7点多钟，他们又接上级命令出发去打南京。尽管极度疲劳，但307团仍然是“第一个赶到浦口江边码头”。103师“原准备309团做渡江先头部队”，在307团一路领先的情况下，就将其改为渡江先头部队，309团做二梯队。

由于找不到船只和渡江器材，307团没有成为第一支渡江进入南京的部队。他们在浦口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待命。后来，103师侦察连找到一只小木船，渡江后与江对岸的南京下关发电厂的工人一起开过来运煤船“京电”号，然后更多船只陆续来到，35军渡过长江、进了南京城，把红旗插上了总统府。

## 横扫土匪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后，35军被解除警备南京的任务，南下进驻杭州。6月，307团作为35军机动部队被调往建德。在淳安、桐庐、分水一带执行剿匪任务，与兄弟部队一起拉开了浙江剿匪的序幕。剿匪任务开始后，刘金山升任307团团团长。9月，刘金山率领307团又随35军军部到浙江金华地区一带剿匪，兼任金华军分区参谋长。

国民党军败退前，在金华组建了12军203师八婺纵队，委任原203师突击第一营少校营长邢小显为八婺纵队纵队长。他们公然向群众派粮派款，袭击我新生地方政权和工作队。在307团刚到来之前，他们曾于9月1日攻打丽水地区的宣平县城。10月2日，307团后勤处主任张义黎率领留守人员与病号，行军到兰溪马涧镇青峰桥地段时，遭到八婺纵队袭击，7人牺牲，部分战士被抓走，战马等物资被抢。面对猖狂的国民党残兵，刘金山亲率307团部队进行清剿。邢小显匪部很快溃不成军。刘金山遵照上级指示，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双管齐下，多股匪徒先后投诚。1949年冬，邢小显残部被改编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八婺纵队，邢任司令，但其实力已大不如前，只能龟缩山中。

1950年1月，35军军部机关和部分部队5000余人前往南京参与组建华东海军，307团担负金华地区主要的剿匪及保卫交通线任务。之后，307团部搬到兰溪县城，刘金山曾兼任中共兰溪县委书记，带领307团继续与土匪激战。邢小显部屡遭打击后很快土崩瓦解，然而邢小显却侥幸逃脱了。1950年12月5日，浙江省政府作出《继续贯彻歼灭股匪、肃清散匪及捉拿匪首的补充指示》。1951年1月，快到春节时，307团将要调离金华，到沿海去执行海防守备任务。刘金山给全团官兵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在春节前将邢小显抓获。2月3日，邢小显被4连包围，中弹后伤重而死。4连缴获了汤恩伯授予邢的“八婺纵队司令”委任状。

消灭邢小显后两天，1951年2月5日，103师番号被撤销，部队被改编为浙江省第3军分区（衢州军分区），承担海防任务。307团各个连队从金华、兰溪坐火车到萧山，行军到台州，然后登上玉环岛，开始守备海疆。103师307团番号改为105师315团，刘金山担任105师参谋长。

1952年5月，105师改为公安第17师，隶属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建制，刘金山任公安第17师参谋长（后担任副师长）。315团改编为51团，守备洞头岛。

1957年1月，公安第17师51团改编为守备第17旅第84团。1958年1月，再次改番号为守备第84团，从洞头岛调到南麂岛担任海防任务，隶属于温州军分区。1969年12月，守备第84团改称南京军区守备第28团，建制、领导、驻地、任务不变。1976年5月，该团与江苏省军区独立1师步兵2团合并，仍称南京军区守备第28团，划归盐城军分区领导。1978年10月，由盐城军分区调归南京军区守备第3师领导。1979年4月，重新归盐城军分区领导。

1985年9月，守备第28团缩编为守备营。1993年1月，该守备营并入盐城军分区驻江苏省射阳县的海防营，部分人员交流到驻江苏省海门市的南京军区海防第3团。所以，直到今天，这支传奇的抗日部队仍坚守在海防线上。



# 在沂蒙战斗过的“隐形将军”—— 韩练成传奇

韩 兢



韩练成

韩练成（1908—1984年），宁夏固原人，1925年从军，在国共两个阵营都曾是传奇人物，在国民党蒋介石身边，他曾受到三个对立派系高层的共同信任：被冯玉祥誉为“在北伐时与我共过患难”、在抗日正面战场带领桂系主力、甚至在莱芜战败后反而贴到蒋介石身边参与最高机密。

在共产党阵营，他与周恩来建立了秘密而密切的单线联系，周恩来说他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称赞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泽东更说：

“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以致蒋纬国在1996年还说他“是隐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韩练成最后被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历任兰州军管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副省长等职。

## 解放战争中秘密战线立奇功

1946年9月上旬，因剿共不利，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受到通报处分。十月上旬，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准备调整编第四十六师在上海吴淞口登陆。部队由海路转运期间，韩练成被蒋介石召去南京，列席了由蒋主持的有白崇禧、陈诚等人参加的最高级别军事会议。会议中，蒋介石命令整编第四十六师改向青岛登陆，直接投入内战。

韩试图向周恩来作汇报，周通过秘密渠道转告韩：“速去上海找董老谈。”韩立即转赴上海，在白崇禧公馆秘密约见董必武，把全部情报交董老速转党中央。

1946年底，整编第四十六师到山东不久，华野派遣刚出狱的新四军干部陈子谷持“洪为济”的信来找韩练成，随之又有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华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来联络。

按照蒋介石“以临沂为主战场，歼灭共军陈毅主力”作为鲁南会战的战役想定，韩率领的整四十六师加入北线兵团，由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配合南线集团，在临沂会歼解放军华中主力，或迫解放军退入沂蒙山区而歼之。

1947年2月中旬，华野放弃临沂、秘密北上。韩练成一再干扰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李仙洲、韩浚等人“李兵团应立即由莱芜向吐丝口、明水突围”的决心，直到李仙洲在2月21日夜下令

突围时仍然强调“未部署妥当”，硬是推迟行动一天。李兵团突围开始，韩练成即放弃对第四十六师的指挥，使李兵团陷于混乱：战役结果是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7个整编师，俘李仙洲以下计21名将级军官。当日下午，韩练成由华东野战军派出的联络员引导到达新华社前线分社驻地。黄昏时分，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唐亮赶来，相见甚欢。

临别时，韩留下诗一首《莱芜战役后赠陈毅同志》：“下民之子好心肠，解把战场作道场。前代史无今战例，后人谁说此新章。高谋一着潜渊府，决胜连年验远方。一割功成惟善用，还将胜利庆中央。”

战役结束，韩练成带另一联络员日夜兼程赶往青岛，经上海回到南京。蒋介石没有怀疑韩，反而称赞他“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全军覆没的韩练成未受到处分。

1947年3月底，蒋介石亲自下令，调韩练成入国民政府参军处任参军。参军处时由上将参军长1人、陆海空三军将级参军10—15人组成。韩这次在蒋身边参与机要的程度要高很多：送蒋看的战报最后经韩过手，蒋批出的命令最先经韩过目。

5月的孟良崮战役前，对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到底是走还是守，韩在关键时刻对蒋说了一句：“共军善打运动战，我们在鲁南（莱芜）就是在运动中吃的亏。”促使蒋介石下了决心：七十四师死守孟良崮、吸住共军、四面合围、歼灭陈毅主力。结果七十四师全军覆没。

后来，整编第四十六师有个团长逃回、华野有个团级干部叛变，都谈到韩在莱芜战役中的失常表现，杜聿明把这些迹象向蒋介石作了密报：“如果韩练成不是共产党，倒还罢了；如果是，那咱的计划、战报都在他皮包里，他又天天跟在校长左右，这个仗，咋个打法？”但蒋知韩杜不睦，并未置疑。

1948年春节前后，韩练成两次去香港休假，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结识了绍敦公司总经理、昆仑电影公司的后台老板、地下党员蔡叔厚，也结识了费彝民、何贤等党外朋友，定下了经香港脱离国统区的路线。

4月上旬，蒋单独召见韩，派他去任甘肃省的保安司令，向张治中报到。但接到任命，居然降为“西北行营副参谋长、甘肃省保安旅旅长兼兰州保安司令”。

1948年10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练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情报，但碍于蒋对韩的信任，不便公开抓韩，只发一密电，要求张治中立即派人“送”韩回南京。张并未照办，只交韩一封不封口的信件，要他立即赴南京直接面呈蒋介石，韩在飞机上看“信”时，却见不过是一份当天报纸！韩悟出是张给自己提供机会，趁飞机在西安加油时，韩通知了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有要事面见校长。韩一到南京即被俞派来的总统府专车接走并直接见蒋，何应钦派来“接”韩的人无从下手。

几天后，韩练成只身去了上海，拿着总统府参军处参军唐君铂在年初提供的空白护照，填上了昆仑电影公司摄影师“许冰”的名字，乘飞机潜入香港。

1948年11月23日深夜，韩练成和第二批爱国民主人士一起乘挪威籍商船北上解放区，1949年1月到平山。此一阶段，韩练成先后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独接见。

## 要“党员”不要“上将”

1949年8月，韩练成担任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月，韩练成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主席是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此时此地见到张治中，韩仍然口称“张老师”，张当着彭、习等人的面说：“在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韩已了解放区时，蒋一把打落了桌上的玻璃杯，指着何等大喊：‘都是你们逼的！如果不是你们贬他一个中将当旅长，他怎么会走？’”张还说，他问过周总理：“韩是蒋身边的红人，并非常人从表面上看到的‘杂牌’军人，也不是受排挤、没出路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跟了



莱芜战役被俘的国军

共产党走？”周答：“这正是信仰的力量。”

周恩来作为韩的证明人：“他是一个没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由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作韩的入党介绍人（韩练成在1950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9月，时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前，周恩来总理曾征求过韩练成的意见：根据他的条件和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民党军军长对待，完全可以授上将军衔。

韩却明确表态：“和平建国，我就该功成身退了，还争什么中将、上将！何况，你是最了解我的人，我是什么起义将领？再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着功名利禄。”他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他不仅没有接受对起义将领的授衔待遇，连发给他的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奖金都没有接受，看都没看就交了党费。

在撰写韩练成传记时，许多老同志、老前辈告诉笔者：周总理很赞赏韩，经常讲“韩练成要党员不要上将”，但笔者查不到这一段记录。1994年1月10日，原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对笔者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亲口讲给我们听的，你到哪里去查？我说的就是史实，你给韩练成同志写传，一定要写进去。”他还多次强调：“写韩练成同志，不仅仅是你写自己的父亲；更重要的是：你写的是周总理领导的秘密工作，写的是共产党的一个历史侧面，写的是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 忆南下

尹作让

## 一、南下前的形势

在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建国。1946年6月，“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蒋介石撕毁重庆国共谈判的“双十”和平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1月又发动了重点进攻。经过了南征北战的一系列战役以后，形势逐渐扭转，我军由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反攻。

在三大战役以后，已成“我强敌弱”之势，我军乘胜向全国进军。在此形势下，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北方干部随着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春节期间，新华社再次发表了社论《光荣的岗位在江南》。

1949年2月，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在华东局华东军区驻地山东青州正式组建。在有早一批南下干部参加的会议上，华东军区司令陈毅、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军区副政委谭震林（三位领导均为南方籍人）等作了解放战争反攻形势的报告。说明南方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支援。随即又发动了第二、第三批更多的南下干部（南下纵队总部后来进驻上海）。

## 二、调干任务

从1948年下半年至1951年，山东先后调出四批数万名党政和武装干部。第一批到大别山地区；第二、三批同时参加渡江战役；第四批到大西南（有大批部队向外调出还不在于其内）。

经过日寇“三光”政策和内战重点进攻遭到严重破坏，老解放区人力、物力、经济已做出巨大付出的情况下，再抽调人力已是雪上加霜。调干工作开始后，虽然不是自愿报名，但绝大多数都服从调动。为了胜利解放全国，大家全然不顾南下后个人结果如何，能否活着，何时回来再见可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乡亲们。

特别是1949年2月的一批人数最多。规定各级班子人马一分为二，组成两个班子，走一留一。上级要求“走者”年龄身体更强一些，号召“走者愉快，留者安心”。

仅我所在的沂南县即奉调包括县委书记高复隆、县长翟翥武等30多人，我为领导的县公安局除我以外还抽调了十多人。全体出操回来后，我在队前作了动员宣布。因我亲自参加南下，其他被抽调的人员都没有任何犹豫。走前搞了一次告别会餐，也是过年团拜活动。团拜时还请县委县政府领导参加（当时只有我们公安局参加生产有劳动所得，才有会餐的条件）。

## 三、南下建制（军编）

南下干部总名称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直属华东局、华东军区。关于纵队序列：鲁中南调出的为第一支队（后来被分配随野战七兵团参加解放浙江）。其中沂蒙地区调出的为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后来参加了杭州周边天目山一带第九（临安）地区11个县的解放和政权接管。我们沂南县调出的为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后到余杭县。蒙阴县调出的为第七中队（其中有半数人不是蒙阴籍人）参加临安解放与接管。还有从鲁西南抽调两个中队分别到于潜县和吕化县。

南下配备班子中区别不同情况有进有出。如七中队即从蒙阴到临安的班子，原蒙阴县委书记吕子仪被任命为大队及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民运部长。原沂蒙军分区人武部政工科长杨泮星为七中队队委书记（即县委书记），我被任命为七中队组织委员（即县委组织部长）。蒙阴县南下班子中无民运委员，原沂南县人武部副部长王茂松被任命为队委委员（即民运部长）；原新泰县县委宣传部长翟作标被任命为七中队队长（即县长），后又调到安吉县任县委书记。后由原蒙阴县原区委书记（任宣传部长）的安成夫任临安县县长。

#### 四、学习与行军

鲁中南的南下干部首先在徐州附近集合学习，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两个务必”和“浙江介绍”，吕志先等讲课。

经一个月的学习后，我们乘火车至新安县（今江苏新沂市）进行了轻装，准备向长江以南徒步行军，经“两淮”至高邮待命。行军中每人负重除武器外不得超过十斤，一般每天30公里左右。行军关键靠两只脚，所以每人要保证穿一双、备一双合脚的鞋子，并保证每晚一定要热水洗脚（防脚泡），挑脚上的血泡。徒步行走长路要扛得住脚泡才能不掉队，有行军经验的情况好一些。每个中队还配备一辆小木车以备病号用。

南下行军中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春天越往南天气越冷。南方阴雨天多，五六月份还要盖棉被（在北方的四五月份以后即不需要棉被了）。我们由于“轻装”前进，拆掉了棉被，丢掉了棉絮，夜间每人一条薄床单，冻得缩成一团。

在高邮、宝应期间，组织上连续发出数次通报要求我们：

一是在生活方面：苏北多水汪地区，注意安全，不许单人行动； 厕所极少，学用马桶；尽量学几句当地常用语，便于沟通。

二是时事消息方面： 太原已解放； 国民党谈判代表团赴北平；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八项谈判条件。

#### 五、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渡江进军命令。当晚至21日凌晨，我军从



南下途中

九江至江阴胜利渡江30万人。23日解放南京。

我们南下纵队一支队二大队奉命于4月30日夜行军从扬州、镇江之间在阴雨连绵中渡长江。我们乘坐的小型轮船经过江中心（被我军命令停泊的英国挑衅军舰旁边）往长江南岸前进（此时长江上空还常有敌机盘旋），半个钟头后轮船靠上南岸。

渡江前既要吃饱又要喝足，以支持步行的体力，又不能太饱太足，以免在渡江和渡江前后大小便。渡江前我们已步行四五十里，渡江后当夜又步行四五十里到达丹阳。早上群众自发地来看望我们（此时我军渡江前线指挥部已到达丹阳）。

两天后，我们从丹徒车站乘火车经无锡到苏州。苏州是解放上海战役的外围，战火还在激烈进行中。

两天后我们乘船经平望、南潯至湖州。住湖州期间，那里虽已有军管会，但仍处于无政府状态，骆驼桥边上银元市场贩子盛行，夜间不时传来冷枪的声音。

5月10日，我们乘船抵达杭州，在拱宸桥礼堂听了浙江省军管会领导人谭启龙的形势和接管报告（此时青岛、上海、舟山均未解放），随即宣布我们沂蒙地区南下干部整体分配到天目山浙西地区，这明显有战备因素。1950年，省军区在临安边林角建立了陆军战备医院，根据省里的部署在临安山里储存了大量战备食盐。

## 六、会师与地区机关的组建

在此期间我们大队与坚持敌后的金肖支队会师（由支队政委张凡同志率领），组建浙江省第九（临安）地区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领导班子。张凡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原任地委书记的南下干部刘夏峰任地委副书记。第一任专员程鹏（后因在潜剿匪中负伤，专员由肖方州接任），张耀辉任军分区司令员、地委委员。地区机关先驻唯一有电灯的余杭县，后来又迁移至第九地区所在地临安。地专机关没有房子，暂住县政府，县政府机关搬到石山头和上下泉村暂住。

此时杭州、余杭、临安等地在市场上仍继续使用早已严重贬值的金元券。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也已经开始流通，并对金元券折价兑换以减轻人民群众的损失。银元也在市场流通。三种货币同时在流通，整个市场也在照常营业。

## 七、南下纵队第七中队进驻临安

我们第七中队共85人（其中一人是北上南下的临安籍人），均为汉族，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女同志5人。另有“解放成分”2人。在中队指导员杨泮星等率领下，由杭州乘敞棚汽车颠簸近两个小时后在黄梅春雨露天雨淋中于1949年5月19日到达临安（吴越钱武肃王故里，宝塔山下，我新四军在1945年抗战时曾解放过）。虽然有雨，依锦镇上的人民群众仍自发地在门前目迎目送。我们当天住进太庙山附近，以油灯蜡烛照明宿营。

此时临安县的政治形势是：金肖支队已派孟勇、沈子球等十多人先行到达临安，名义是金肖支队天目大队、天目办事处。金肖支队会师同志后来参加了县机关和县大队工作。

伪县政府及伪第九专署的伪专员杨维礼和伪县长徐渭浔均已潜逃。伪自卫大队300多人未正式缴械，原建制原封未动，并称已经投降。“金肖”的极少人员与他们数百军政人员同在，而他们在背后已有不规活动。

在于潜发生所谓起义的原伪自卫大队反水后，他们在1949年6月28日攻回县城，攻入我县政府，打死我十多人。根据约法八章，浙江省军管会、省军区命令第九军分区高司令来临安指挥，对伪自卫大队集中训话并命令就地放下武器，人员按政策自愿者参加我县大队，愿回乡者发给路费（自愿再入伍者居多，同样也留用了一部分伪职人员），其他县也照此同时进



行。此举使临安等县免遭类似于潜的一场大的流血伤亡事件。

1949年6月5日，中共临安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临安县县委委员六人。其中分工：书记杨泮星、县长安成夫，组织部长尹作让，民运部长王茂松，副县长王兆来，公安局长周韶琴。

在解放初期，地县委一律实行委员制，不实行常委制。干部待遇仍实行无工资的供给制。天天吃酸菜、吃大毛笋；定量米不够吃，就吃稀饭，吃玉米饼或一天只吃两餐。我出差在三口乡农户家吃饭，农民只有玉米糊和葛藤根。

大家虽然年纪轻、身体好，但仍冻得全身发抖。直到冬季才发到棉被，而这里跳蚤、臭虫太多睡不好，许多人都发了疟疾。那时我才25岁，身体也好，但也连发了两次疟疾和一次伤寒。解放初期干部变动较快，如1950年6月因安吉需要，安成夫调至安吉县任县长，由我接任临安县县长，并任县委副书记，王茂松接任县委组织部长。

1951年因地委需要，杨泮星调至地委党校任校长。临安县县委由我主持工作，从新登县调来的韩兆贤任临安县县长。

1952年10月因于潜需要，我调至于潜县任副书记、书记。王茂松任临安县副书记主持工作。

## 八、新解放地区任务

根据浙江省军管会谭震林、王建安、谭启龙的指示，按照约法八章的精神，县委县政府建立以后，当时主要工作是宣传发动群众，废除保甲制，建立基层人民政府，组建工农青妇群众团体；行政任务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预借公粮，减租减息，救济灾荒。此间我们吸收了大批新干部，也发展了一部分新党员。

在五月下半月至六月上半月正在进行上述工作的时间，各地出现了土匪抢劫杀人事件。此时此刻，“乌云”四起，群众情绪恐慌。

6月28日于潜县县城遭土匪进攻，其他县也有许多镇政府被土匪包围，抢劫，杀人。如临安县的横畈、板桥、青云桥等区乡遭匪包围，我横畈区区长牛景羲同志负重伤。

此后，根据中央军委、省军管会命令，所有新解放区转入以剿匪为中心，在主力部队支援下，军民、军地配合，剿匪工作在八九月份取得基本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10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镇压反革命条



当地群众欢迎南下干部

例》，我们继续剿匪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接着根据《土地改革条例》开展反霸、土地改革运动以及抗美援朝运动（后称“三大运动”）。经过“三大运动”，基层政权、人民团体基本建立并巩固。此后，社会秩序根本好转，人民群众翻身后的精神面貌大大提升。此间还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有了政治基础和三年经济恢复及朝鲜停战之后，我们的工作进入民主建政，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41”项建设……

## 相关链接

### 山东干部南下的历史背景

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提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为贯彻“九月会议”的决议，1948年冬，华东局各战略区领导召开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华东局中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的中央决议将完全由山东来负责。《指示》要求，抽调南下的一万五千名干部分两期筹备：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抽调三千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抽调一万两千人。《指示》并就抽调一万五千名干部的落实工作进行了具体分配：鲁中南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胶东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50人；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济南市配备1套区党委级、2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576人；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潍坊市配备3套县委级，共调干部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除配备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级、5套半地委级、15套县区委级外，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计3009人。

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为便于统一行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

从1949年3月初开始，山东各战略区的南下干部经过短期集训后，按照中央和华东局要求，1.5万名干部先后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干部南下”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作出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南下干部”在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们的历史功勋不仅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更体现在新政权的建设时期。“南下干部”纵队与南方的当地人民融为一体，忘我奋斗，他们对南方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 抗战八年的滨海区 and 滨海八路军 (下)

谢辉、刘鸿若、张万祥、韩枫、万里云、段维绍集体座谈。万里云执笔

## 六、同困难搏斗

1942年春，滨海成立独立军分区，何以祥同志为司令，王叙坤同志为政委，我区斗争力量进一步集中，领导上也进一步加强，经过整顿“三风”运动，全体同志对面临的艰苦斗争充满百倍的信心。

日寇因鉴于我滨海军民之不可征服，遂施行其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蚕食政策，即政治上怀柔、瓦解，经济上冻结、封锁，军事上分割、打击，四周屯集重兵、步步为营，向我推进，企图室死我区，消灭我英勇的抗日武装力量。

抗战阵营内部亦有重大变化。8月3日，东北军名将万毅将军力主团结抗战，而五十七军孙焕彩公然背义，占我甲子山区，并不断向我区进攻。我军官兵及抗日工作人员先后被杀者达2000余人。这时，抗战与投降，民主与反民主两条阵线愈加明朗化，滨海军民不但要对付强大的敌人进攻，还要提防心腹之患，加以敌人蚕食封锁，军事上直接破坏，使滨海各方面均感困难。特别军队供给几乎陷于绝境，连发霉的地瓜干和粗糙的煎饼都不能保证供给，战士的体质遭到严重摧残。教导二旅政委符竹庭同志到一一五师师部去领款，罗荣桓政委为难地将供给部全部经费200元法币交给他，意味深长地说：一切靠自力更生吧！

在陈光师长、罗荣桓政委、肖华主任领导下，部队集中全力，克服困难。上至各级指挥员，下至马夫炊事员，一面省吃俭用，一面努力生产，冒着炎热的夏日，冰雪的寒冬到海边担盐到内地出售，增加经济收入。开荒种地，自产粮食蔬菜，喂养家畜家禽。庄稼园里布满了鲜嫩的蔬菜，牲口栏中饲养着头头肥猪，庭院里散放着群群小鸡。无数的小型木工厂、被



自立更生 丰衣足食





滨海八路军  
在反扫荡中

服厂、皮带厂，在那不引人注意的村落中先后建立起来。仅教导二旅十个月的生产节约就达200余万元。部队的供给改善了，原先赤脚在沙石上奔跑的战士已是面色红润，还穿上结实的皮底鞋。

敌人的经济封锁，不但没能窒息我们，反而使我们得到更宝贵的经验。在政治上亦由于八月间滨海专员公署（谢辉同志任专员，崔介同志任副专员）及滨海参议会（高赞非先生任参议长）的成立，坚决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斗争情绪，保证了低水平的物质生活，人民武装由6100余人，猛增到2万人。在艰苦斗争中，全体军民更加相依为命，亲密团结，使敌人的政治阴谋遭到了破产。

8月1日，山东军区颁布了著名的“八一”训令，明确规定了加强县区武装与发动人民武装的方向、原则，使滨海区的军事建设走向更加坚实的阶段。主力部队经过四、五两期整训，提高了战斗力，装备上也因经济斗争的胜利而逐渐得到改善。这是对党和上级号召“创造模范铁的军队”的响亮回答。

11月间，我教导二旅为打乱敌伪的蚕食计划，发动海陵反蚕食战役，大军到处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在短短的五天内，使敌新浦宪兵队的“别动队”司令杨步仁遭到重创，使之失掉16个据点、600多个喽罗、400多支枪。军分区部队协同动作，勇猛扫荡沿海敌伪，先后光复重要港口岚山头、安东卫等据点，在军事上也打破了敌人的阴谋。

年底，我一一五师教导五旅从江苏开抵滨海，更增强了滨海区的力量。盘踞在甲子山区屠杀人民的孙焕彩部，被迫逃窜路北。

## 七、光复路北

1943年1月，我滨海主力教导二旅一部以奔袭战术，一举攻克郯城，首创敌后攻城范例，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二年多的兵站基地，城中敌伪人员一无逃脱，大大振奋了人心。

与此同时，教导五旅在巨峰重创正在扫荡中的敌伪，使敌寇惊呼为“黄老虎”（教导五旅穿黄军装）。敌人在我严重打击下，更加惊慌和残暴起来，一面加紧蚕食、扫荡，一面极力推行所谓“第五次强化治安”，造谣欺骗，花样翻新，挑拨军民关系，一切反民主力量都变成日寇爪牙，全区四周整日炮火连天，战斗紧急，敌伪据点在边沿区纷纷建立，海陵县被蚕食得只剩下两个完整区（原有6个区），沐河两岸更是碉堡林立。1月4日，又突入我醋大庄安设据点。莒县被摧残得只剩下一个完整区（原来有11个区）。敌伪先后在周围共安设46个



据点，蚕食了143个村庄，（内有53个村庄由根据地变成游击区和敌占区，90个村庄由游击区变成敌占区）。

我军为应付时艰，履行党中央第三次精兵简政，大批坚强干部充实到地方上去，与民兵、群众共同坚持战斗。同时为了加强一元化对敌斗争的领导，又奉命于4月成立滨海区党委及滨海军区，身经百战的陈士榘、符竹庭、刘兴元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我区军政建设开始走向正规道路。不久召开了全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有力地贯彻执行了山东分局的五个中心工作，内部组织机构也日趋健全起来。

针对敌人的“强化治安”与蚕食政策，区党委及军区坚决执行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正确方针与山东分局“坚持阵地，积极向边沿活动，伸展到敌占区”的指示，以及山东军区罗司令员“翻边战术”，抽出富有斗争经验的军政干部，组织卓越的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一面宣传与组织群众，开展敌占区工作，一面把政治攻势与军事行动密切结合起来，包围据点喊话，打击与逮捕敌特，提高敌占区同胞抗战胜利信心。

同时，我更发动一次万人大破袭临郯公路，在300里长的沭河东岸，数千英勇的民兵，日夜监视敌人进行大戒严，并把醋庄团团包围，使敌伪毫无活动余地。

是年夏天，盘踞路北之孙焕彩部在日寇的威逼与进攻鲁南的国民党李仙洲部的威胁下，大量搜刮路北人民的物质财富后仓惶逃窜。诸高一带之大汉奸张步云趁机进占路北。我教导五旅挥师北上，讨伐叛国投敌之张步云（前国民党新编第二师师长），将其驱出五莲山区。我粉碎了敌伪数千人之报复“扫荡”，伪皇协军第五旅全部为我们所歼，解放了8000平方里土地、30多万同胞、330个村庄，建立了日北、莒北、诸莒三县政权。在滨南我教导二旅一部一举攻克赣榆县城，消灭伪旅长李亚藩（原国民党五十七军副官长）以下2000余人。我军区政委符竹庭同志于是役后不久敌人报复“扫荡”中光荣牺牲。

## 八、反攻前夜

1944年是滨海军民响应党中央号召集中力量准备反攻的一年。为了打击日寇，配合盟军登陆，全区军民秣马厉兵，进一步开源节流，积蓄物资，夺取战略要地。2月间，首先扫除内



讨李战役中的八路军战士

地伪据点石沟崖、纪家店子，消灭巨奸贯匪朱信斋部400余人，使我南北根据地连成一片。3月间，又以沐水、夏庄为中心发起攻势，拔除敌伪据点七处，打通了与鲁南交通的通道。7月间，发动空前规模的讨李（永平）战役，我军远征山东半岛南部，在百里战线上横冲直闯，连克敌伪据点30余处，把李逆部压缩于泊儿镇一隅，建立了诸胶、藏马两县民主政权，确保了滨北有力的战略支撑点。滨南部队亦配合行动，攻下醋大庄、九出店等10余处据点，占据了有利地形。

敌寇在我连续打击下，集中5000余兵力进行“扫荡”，企图破坏我反攻准备，遭到我军民节节阻击，使其半月之“扫荡”计划不得不在一周中草草收兵。

11月，我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扫除内地敌伪据点，又发起震撼山东的莒城战役，攻克据点十余处，伪莫正民3500余人反正（莫部后改编为独立第二旅，莫为旅长）。

与此同时，大约在3月间，专员公署改成行政公署（谢辉同志任主任），进一步加强与统一了民主政权的领导。在军队中亦广泛开展了练兵、生产、拥军爱民和拥军优抗四大运动。在练兵运动中，由于采取走群众路线的方针，培养出大批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能投68米的投弹手，部队的作战技术也有空前提高，出现了无数何万祥式的战斗英雄。在拥政爱民中，部队协助政府、帮助群众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出现了大批拥爱模范，清洗了部队中兵痞和游离思想，使每个战士都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在生产运动中使部队能自给全部生活费和50%的经常费用，平均减轻全区群众3.5元的负担。特别由于整风运动的深入，指战员的思想更加明确，行动更为一致。

由于减租减息、查租查息运动的深入，政治、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我军胜利的鼓舞，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开展了拥军、参军、生产运动，许多老太太送儿杀敌，无数年青姑娘送未婚夫参军，千千万万的青年骑马坐轿戴红花，加入到人民的军队里去，出现了无数拥军、参军模范，以及郑信式、刘兴义式劳动英雄。

在这光辉的1944年中，我军又解放了约1.475万平方里土地、1500个村庄、80万同胞。

## 九、粉碎敌人之“重点配备”

1945年春天，在我党、我军影响及争取下，滨北伪张希贤部1300余人反正，被改编为独立第二旅（张任旅长），同时扩大了诸东抗日根据地，这又给敌人以一次严重打击。是年夏天，日寇一切措施遭到严重挫败之后，不得不改变其“分散配备”为“重点配备”，提出“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一方面有重点的增强战略据点、交通要道及重要资源地之军事防御，收缩机动兵力，整编伪军，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则加强特务活动，采取各种方式向我反扑。加以我反攻日近，敌10万关东军仓惶入鲁，防止盟军登陆，拼命控制沿海。5月2日，日寇集中陆海空军近万人，大举“扫荡”滨海区，企图第二次破坏我反攻准备，但经我军民英勇奋战，给日寇以迎头痛击。光荣的何万祥连以80勇士重创1500日兵于大山，写下抗战史上悲壮的一页。我二十三团二连又击败日寇于安东卫，我四团“钢八连”痛歼敌寇于柘汪。民兵则到处开展地雷战，使敌伪寸步难行。经20余日恶战，敌人不得不结束其疯狂行动而蜷缩于沿海一带。我军则乘胜反击，连克日照的叉和岭、凤凰山、陈家庄、烟墩岭、千里铺，郯城之刘港口、田小埠、刘庄、小围沟等14个据点，敌陇海路白塔埠车站之水塔亦遭我轰毁。这次反攻前夜的反扫荡先后共进行50余次战斗，毙伤敌小队长以下百余人，毙伤伪大队长以下900余人，俘虏200余人，解放村庄20个，使敌人的重点配备遭到惨重打击。

自此以后，滨海形势日益紧张，每日炮声隆隆，沿海开展空前的争夺战，我二十三团在五月份，平均每天有一次战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东紧西松”。

在“东紧西松”声中，我全区军民为配合盟军登陆，不惜以重大牺牲来保卫沿海，除粉碎敌人五月大“扫荡”外，更主动地进攻敌人海防，摧毁其沿海据点，我警备团在芦家村战



诸城伪军张  
希贤部反正

战斗中歼敌百余，副团长贾振远在此次战役英勇牺牲。新征战斗中我独立团政治处主任曹吉庭也光荣牺牲。

同时，针对敌人“重点配备”，区党委及军区均发出专门指示，并组织特别会议讨论，当时决定在军事上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与加强小分队及武工队活动，开展分散性游击活动，以主力为核心，地方武装为骨干、民兵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斗争，昼伏夜击，声东击西。政治上以反敌特为主，宽大与镇压相辅而行，继续开展政治攻势。由于政策的落实，边沿区军民更加团结，一致对敌，使敌人的“重点配备”反而成为他们的牢笼。

## 十、胜利大反攻

1945年8月10日，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滨海军民反复看着日寇投降的消息，第二天就将部队改编为解放军。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勇猛地向各大城市进军，后方所有的机关、工厂均以飞快的速度工作，支援前线。千万个民兵也都随军进发，我解放军第一师及滨海支队越过崎岖的五莲山区，席卷胶济平原，首克胶县，尽歼张鸿飞部2000余人，再下诸城，又毙伤俘张逆云所部2000余人。我二师在滨南连克赣榆、日照、石臼等重要城镇，后又配合友邻部队攻克临沂，先后攻克大小据点百余个。10月间，我警备部队又扫除滨海最后一个敌伪据点泊儿镇，歼伪于炳晨部2000余人，至此全区全部解放。



# 闵子宰费考实

平凡



闵子骞芦衣顺母（剪纸）

闵子骞（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87年），名损，字子骞，春秋末期鲁国人。他是孔子的高徒，为七十二贤人之一，在孔门中以德行和老成持重著称，尤以孝行闻名，世称闵子。

闵子骞是否做过费宰，一向存有争议。虽然《论语》明确记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表明闵子骞已经态度坚决地拒任费宰。但是很多人仍然坚信，后来闵子骞在孔子的劝说之下，最终还是怀着为国效力的想法，做了费宰。他们的依据，就是《孔子家语》中的“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这句话。闵子后裔更是拿出《闵氏世家》、《闵氏家乘》等谱牒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闵子骞故事传说，说闵子骞不仅做过费宰，而且在费邑行仁政，施德治，政通人和，物阜民丰，不出一年，因为得罪季氏而辞职。

闵子骞是否做过费宰呢？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本文只能依据古代典籍的记载加以辨正。

## 一、《论语》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论语》中涉及闵子骞的文字，总共有5条：

1.《论语·雍也第六》：“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 2.《论语·先进第十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 3.《论语·先进第十一》：“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父母昆弟之言。’”
- 4.《论语·先进第十一》：“闵子侍侧，闾闾如也。”
- 5.《论语·先进第十一》：“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以上所引5条文字，第1条记载的是闵子骞坚决地拒绝担任费宰；其余4条，是说闵子骞的道德人品，都与“费宰”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在《论语》这一权威的典籍中，找不到支持“闵子骞做过费宰”这一观点的有利证据。

## 二、先秦典籍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与《论语》同时或稍晚的典籍中，也有一些关于闵子骞的记载。辑录如下：

《庄子·德充符》载：“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鲁国国君能向闵子骞说心里话，可见闵子当时威望地位已相当高。

《孟子·公孙丑上》载：“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所谓“有圣人之一体”，是说有孔子的一部分长处；所谓“具体而微”，是说大体接近于孔子，但不如孔子那样博大精深。可见当时的人们认为闵子骞已经大体上接近于孔子了。

先秦杂家著作《尸子》载：“闵子骞肥。子贡曰：‘何肥也？’子骞曰：吾出见美车马，则欲之；入闻先王之言，则又欲之。两心相与战。今先王之言胜，故肥。”

这段话表明，闵子骞经过一番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思想斗争，最终“先王之言”占了上风。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季氏以公鉏为马正，愠而不出。闵子马见之，曰：“子无然。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轨，祸被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恭敬朝夕，恪居官次。

有人认为，《左传》中的闵子马，就是闵子骞。

这位闵子马，又名闵马父。《国语·鲁语下》有一篇《闵马父笑子服景伯》：齐闾丘来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闵马父笑，景伯问之，对曰：“笑吾子之大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满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阙而为‘恭’，楚恭王能知其过而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后恭’，道将何为？”

但有人说闵子马不是闵子骞，而是另有其人。据称，闵子马（闵马父），春秋鲁国人，周大夫，封地陇西（甘肃临洮），博古善论，有明见。而据《闵氏修建家嗣碑记》所说，闵马父是闵子骞的父亲。

目前所能见到的先秦典籍记载闵子骞事迹的文字，非常之少。从这些典籍中，仍然找不到支持“闵子骞做过费宰”这一观点的有利证据。

## 三、《史记》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司马迁综合了先秦文献的记载，撰写了《仲尼弟子列传》。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关于闵子骞的记载只有两处，一处是：“孔子曰：‘受业身通

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另一处是：“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

司马迁撰写《仲尼弟子列传》，是在阅读先秦典籍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对比、甄别而完成的。司马迁按照古代史官记言记事的传统，下笔极为谨慎，基本上是引用了《论语》的原话。他在《列传》中特地说明：“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于书传者记于左。”也就是说，从颜回到公孙龙（字子石）这三十五人，他们的年龄及受业情况，都是书传中有明确记载的，司马迁便如实抄录；其余四十二人，他们的年龄及受业情况在书传中没有记载，司马迁只是记下他们的名和字，如“冉季，字子产”、“公祖句兹，字子之”，有的只有名、没有字，如“漆雕徒父”、“商泽”。

闵子骞属于三十五人之一（排名第二）。关于闵子骞的两处记载，司马迁更是忠实地引用了《论语》的原话，不敢随意添加文字。比如，他说“颜回者，鲁人也”，“仲由，字子路，卞人也”，“端木赐，卫人也”，却没有说闵子骞的籍贯（后来的《史记集解》郑玄注，说闵子骞是鲁国人），可见他下笔之谨慎。“闵子马即闵子骞”之说，司马迁也没有采纳。司马迁通过阅读有关文献，得出闵子骞“少孔子十五岁”这一结论。

如果闵子骞后来确实做过费宰，司马迁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因为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多处提到孔门弟子任职之事，如冉求“为季氏宰”，子路“为季氏宰”，子游“为武城宰”。既然司马迁没有提到闵子骞做过费宰，只能说明先秦文献资料中没有记载这件事。

#### 四、《孔子家语》及其作者王肃

司马迁去世300多年后的三国时期，出现了一部《孔子家语》。其《执轡》篇，非常肯定地说“闵子骞为费宰”。原文如下：

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策也，夫人君示之政执其轡策而已。”

子骞曰：“敢问古之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御，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轡，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轡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而马应轡，策不举而极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怀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怀，其政美，其民而众称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无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丰其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譬犹御马，弃其衔勒，而专用捶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无衔勒而用捶策，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国必亡。治国而无德法，则民无修；民无修，则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为乱天道也。苟乱天道，则刑罚暴，上下相谗，莫知念忠，俱无道故也。今人言恶者，必比之于桀纣，其故何也？其法不听，其德不厚。故民恶其残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祸罚，灾害并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

这是“闵子骞为费宰”第一次出现古代文献中。后人说闵子骞做过费宰，都是援引于此。不过，它是一个孤证，没有其他文献记载作为佐证，难以让人信服。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孔子门人所撰，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共有二十七卷，其书早已佚失。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王肃作注，自称得之于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唐颜师古注《汉书》时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所云今本《孔子家语》，是指三国时魏国王肃收集并撰写的十卷本。



王肃（195年—256年），字子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三国时期魏国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他的父亲王朗，就是《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骂死的那位魏军军师，也是一位经学家。王肃的女儿嫁给司马昭为妇，生子司马炎（后为晋武帝）。两汉经学，至郑玄合今古文而集大成。王肃欲与郑玄争胜，撰《圣证论》专攻郑氏，并伪托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以佐其说，遍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氏》作注。王肃以帝王之力，其注传立于学官，其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

一般认为，《孔子家语》是王肃杂取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又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小戴礼》、《大戴礼》、《礼记》、《说苑》等书中关于婚姻、丧葬、郊禘、庙祧等制度与郑玄所论之不同处，综合成篇，借孔子之名加以阐发，假托古人以自重，用来驳难郑玄。宋代王柏的《家语考》，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范家相的《家语证伪》、孙志祖的《家语疏证》，都认为《孔子家语》是伪书。特别是晚近以来，学界疑古之风盛行，《孔子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

具体到《孔子家语·执轡》篇，其内容取自《大戴礼》中的《盛德》篇。试摘录《大戴礼记·盛德》中的几段文字以作比较：

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史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銜勒，以官为轡，以刑为策，以人为手，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懈堕。善御马者，正銜勒，齐轡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手不摇，策不用，而马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敬听言不出于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

夫民善其德，必称其人；故今之人称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犹存者，其法诚德，其德诚厚。夫民思其德，心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丰其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譬犹御马，弃銜勒，而专以策御马，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专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国必亡。亡德法，民心无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为乱无道；苟以为乱无道，刑罚必不克，成其无道，上下俱无道。故今之称恶者，必比之于夏桀殷纣，何也？曰法诚不德，其德诚薄。夫民恶之，必朝夕祝之，升闻于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并兴，灾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

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故六官以为轡，司会均入以为轡，故御四马，执六轡，御天地与人与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马力，齐马心，惟其所引而之，以取长道；远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与人、事，此四者圣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

“闵子骞为费宰”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大戴礼记》中，却出现在后来的《孔子家语》中。个中原因，大概只有王肃自己清楚。

## 五、《费县志》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既然说闵子骞做过费宰，那么《费县志》应当有所记载。

《康熙费县志》之《名宦》篇中，有“春秋费公闵子损”；《名宦祠》篇中，有“闵子祠”。《康熙费县志》将闵子骞列入费县“名宦”，是承认闵子骞做过费宰的。

《光绪费县志》之《先贤祠堂》篇中记载：

先贤闵子祠：祠在县治东闵家寨，金张万公、元邵显祖皆有《碑记》。张记云：“览《费志》，知费为闵侯恭桑之乡。”邵记云：“详览《费志》，邑之东北六十里许有其故

宅，乃遇桓魋之乱，长子沃盈迁于此而卜居焉。”按：闵氏，鲁公族，当居曲阜，“遇桓魋之乱”语，亦莫识其由。惟闵家寨闵氏一族，至今繁衍，长子沃盈迁居事，相传必非无因。幸《碑记》之有凭也。

《光绪费县志》还附有金代费县主簿张万公《谒费侯闵子祠记》、元代费县县尹邵显祖《重修费公闵子祠记》。

但是，在《光绪费县志》卷三《职官》篇中，收录了5个周代邑宰，有：南遗（费宰，鲁人）、南蒯（费宰，遗之子）、公山不狃（费宰，鲁人）、王犯（武城宰，吴人）、言子游（武城宰，吴人）。闵子骞也生活在周代，却没有收录。

同样，在《光绪费县志》卷五《祀典》之《名宦祀》篇中，收录了武城宰先贤言子、唐费县令高智周、宋费县令苏唐卿、明费县知县尚贤、明费县知县杨果等7位名宦，却没有闵子骞的名字。

这不是编纂者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光绪费县志》的编纂者不承认闵子骞做过费宰。

光绪二十二年，参与重修《费县志》的费县教谕刘宝鼎，在《重修〈费县志〉序》中说道：“至于‘闵子宰费’之说，原本《家语》，实为王肃伪作，最足侮辱先贤。”

刘宝鼎所言极是。试想，闵子骞一开始坚决拒绝担任费宰，后来怎么会改变主意呢？岂不是故作姿态、沽名钓誉吗？的确是对闵子骞的莫大侮辱。

## 六、闵子骞拒任费宰的真正原因

季氏让闵子骞担任费宰的时间，国学家钱穆认为是在公山不狃奔齐之时（见钱穆《孔子传》第五章）。

公山不狃原是季氏的家臣，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担任费宰。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与季桓子产生矛盾，联合另一名家臣阳虎一同反对季氏，抓住了季桓子，季桓子用计逃脱，阳虎兵败逃亡齐国。（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阳虎出逃齐国之后，公山不狃仍以费宰的身份盘踞费邑。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已经担任鲁国大司寇的孔子，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就是“堕三都”，目的是抑私家、强公室。所谓“三都”，是指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孟孙氏的成邑（今山东宁阳）。郈邑被顺利地拆毁。堕费时，却遭到了公山不狃的顽强抵抗。当季桓子率领大军前来堕费时，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带领费人避实就虚，直捣鲁国都城曲阜，鲁定公仓皇逃到季氏家中躲藏。身为大司寇的孔子，沉着冷静，率兵反击，击败费人，公山不狃逃到齐国，费邑终于被拆毁（事见于《左传·定公十二年》）。

季氏苦于家臣之凶恶，便考虑从孔子弟子中选择一位知名者来担任费宰一职。此时的闵子骞正值强仕之年，且居孔门德行之科，可谓最佳人选。怎奈，闵子骞态度异常坚决地拒绝了季氏的任用。

司马迁记载闵子骞拒任费宰这件事，并没有引用《论语》原文“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这句话，而是改为“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这正是司马迁认为闵子骞拒任费宰的原因所在。

当时的费邑，并非鲁国国君所辖，而是季氏的私邑。闵子骞如果出任费宰，做的不是鲁国国君的官，而是鲁国正卿季桓子的官，也就是季氏的家臣。闵子骞如果出任费宰，是为季氏私家做事，不是为国家做事，所以他“不仕大夫”，不愿担任费宰。

据史料记载，费地在鲁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成为鲁国上卿季友之私邑（见《左传·僖公元年》），称作费邑。直到鲁元公二年（公元前427年）一直保持着“私邑”这种状



态。鲁元公二年，季氏后裔季孙氏据费邑自立为国，称作郈国。

闵子骞生活的时代，费邑一直都是季氏的私邑。所以，闵子骞当初拒任费宰，后来也绝无可能出任费宰。

至于“不食污君之禄”这句话，权威的翻译是“不吃昏君的俸禄”。司马迁说的昏君是谁呢？

闵子骞在鲁国，先后经历了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三位国君。鲁昭公确实是一个不成器的人物，据说他十九岁继位时，还像个小孩子一样贪玩；参加父亲的丧礼，不但毫无戚容，反而面呈喜色。后来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失败，被迫逃到齐国，辗转至晋国，最后客死他乡。鲁定公是鲁昭公之弟，他继位后，鲁国大权已经被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所控制，鲁定公成为一个傀儡，对鲁国政事不闻不问，全由季孙氏掌控。鲁哀公是鲁定公之子，子贡曾批评过他言行不一，他自己也慨叹“茕茕余在疚”。他带头乱礼，将自己宠幸的侍妾立为夫人，将侍妾所生公子立为太子，“国人始恶之”。他受人怂恿，当面贬责季孟二人食言而肥，与卿大夫交恶，君臣之间水火不容，辗转前往越国，生前再也没有回到鲁国。平心而论，这三个国君都是没有什么作为的昏君。

有人说，“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这句话，是孔子听说闵子骞拒任费宰时说的，被司马迁转述引用。其实，孔子不会说自己的国君是“昏君”，只有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可以这么说。

以我的个人理解，“不食污君之禄”也可以翻译为“不吃有辱国君的俸禄”。做季氏的官，就要为季氏办事，就会做有利于“私家”而不利于“公室”的事情。吃这样的俸禄，岂不是有辱国君吗？所以闵子骞不愿做季氏的官。

当时，季氏大权独揽，对孔子的意见都不买账，对闵子骞的主张更不会采用。闵子如果出任费宰，结局只有两种：要么实行儒家的仁政，最后只能与季氏闹翻；要么放弃原则，与季氏同流合污。闵子骞正是因为看清了这种形势，才采取了一种不合作态度，坚决拒绝出任费宰。



费邑故城遗址

# 诸葛亮

唐士文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琅邪国阳都县（治于今山东沂南县砖埠镇黄疃村）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系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代。其父诸葛珪，东汉末泰山郡丞。诸葛亮3岁丧母，8岁丧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他15岁时，诸葛玄被袁术任为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太守，诸葛亮及弟诸葛均也随同前往。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叔父诸葛玄病逝，他在襄阳城西的隆中隐居10年，躬耕陇亩，结交名士，关注天下形势。他经常吟诵《梁父吟》，并自比春秋时齐国政治家管仲和战国时燕国军事家乐毅，人称卧龙先生。

诸葛亮少怀大志，心怀天下。他对汉末割据纷争、群雄并峙的局势，高瞻远瞩。建安十二年，刘备经徐庶推荐，与关羽、张飞赴隆中三顾茅庐，诚心求教。他与刘备论述天下形势，提出占据荆、益二州安抚西部诸戎、南部夷越，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共御曹操，一旦天下有变，两路北伐，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统一天下战略决策，即著名的《隆中对》。刘备感慨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他出任刘备军师后，在汉末三国历史舞台上导演了并演出了一幕幕具有传奇色彩的壮剧。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率大军南下征刘表。八月刘表去世，其子刘琮代摄荆州牧，投降曹操。刘备被曹操追迫于夏口。诸葛亮赴东吴，联合孙权，共御曹操。接着，孙权派周瑜、程普率军与刘备共破曹操80万大军于赤壁。刘备乘机占领荆州，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建安十六年，刘备应益州牧刘璋邀请，奉军入蜀。次年，刘备由葭萌关南攻刘璋。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携张飞、赵云逆江而上，攻克巴东、江州，又分兵占领犍为、巴西等郡，与刘备会师，合围益州治所成都。建安十九年，刘璋出降，刘备自领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建安二十三年，刘备进军汉中，诸葛亮留守成都，筹办军需，调集兵员，做到“足食足兵”。刘备于次年占领汉中，于七月自称汉中王。从此，形成曹、孙、刘三方鼎峙局面。建安二十六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拜诸葛亮任丞相。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备病故于白帝城，临终委以托孤重任。诸葛亮竭智尽忠，辅佐后主刘禅，主持军国大事，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兵分三路南征，相继平定了益州、越、三郡的叛乱。又渡过泸水，讨伐骚扰边境的少数民族，“七擒七纵”孟获，终于使南境安定。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冬，诸葛亮统率10万大军北伐

曹魏，临行前，写下了著名的《出师表》。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在第五次北伐中积劳成疾，病逝于武功五丈原军中，享年54岁。谥曰忠武侯，葬于定军山。杜甫《蜀相》诗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他治军谨严，长于巧思，精通兵法；尝作八阵图，创制“木牛流马”。著有《出师表》、《隆中对》、《诫子书》等。清人张澍辑有《诸葛亮集》，收录其著作178篇。

诸葛亮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兴复汉室”、忠君报国方面。其军事思想则体现在战略与战术思想、治军思想、兵器革新等方面。其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奖励农耕和发展手工业方面。《三国志·诸葛亮传》称他“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诸葛亮感人至深的佳言懿行已成为宝贵经验和楷模风范：一是廉洁清正。作为丞相之家，不仅没有多余的钱财，而且其妾的衣服也少得可怜，“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诸葛亮《又与李严书》）。他去世后，墓穴只能容棺，不用随葬品，几乎和平民百姓安葬一样，这和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形成强烈的对比。二是教子育人。教子育人思想，集中体现在《诫子书》、《又诫子书》和《诫外甥书》等给晚辈的书信之中。为了不使后代成为“凡庸”、“下流”之人，诸葛亮让他们到实践中接受锻炼。在他的教育下，其子诸葛瞻、孙诸葛尚都在与魏军作战中壮烈殉国。三是虚心纳言。他主张既要采纳自己部属官吏的意见，又要采纳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等方面人士的意见。如果“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倍，邪者容其奸”（《诸葛亮集·视听》）。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论诸葛亮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是对诸葛亮公允的评价。



苏轼书诸葛亮《出师表》



# 溯流探源说“求鱼”

——从“王祥剖冰”到“卧冰求鲤”嬗变的轨迹考察

张铁民

王祥持之以恒的孝行故事，凭借它惊世骇俗的魅力，像一只天外飞来的金丝鸟，穿越千年历史风雨，从晋代一直飞翔到当今，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对我国以“事亲养老”为核心内容的孝道蔚然成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祥的孝子形象，也镌刻进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底，成为百世敬仰的孝行楷模。正因为如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经开展，“卧冰求鲤”故事，即荣登“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长久以来，对这一感天动地的故事本源，却有不同的阐释。对其在当代的现实意义，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作为先贤王祥故里的一名文化工作人员，笔者将从学习的角度入手，溯流探源，对纷纭繁复的众说，做些探寻，供读者诸君辨析，做出自己的判断。

## 故事本末

王祥的孝行事迹，考诸史籍，首见于裴松之作注的《三国志·魏书·吕虔传》。文中，裴松之引东晋史学家孙盛《杂语》说：

祥字休征。性至孝，后母苛虐，每欲危害祥，祥色养无怠。盛寒之月，后母曰：‘吾思食生鱼。’祥脱衣，将剖冰求之，少〔顷〕坚冰解，下有鱼跃出，因奉以供。时人以为孝感之所致也。

经众多专家、学者研究论定，这应该是王祥孝行故事在正史中最早的记载。这段记述虽然比较简括，但应当是可信的。因为《杂语》的作者孙盛生于公元302年，歿于374年，大致和王羲之为同代人，距王祥在世不足百年。裴松之系南朝宋人，生于公元372年，歿于451年，距王祥也仅仅百余年。两人均距王祥之世不远，史籍文书中的记载，依然历历在目；散布在民间的口碑，也犹言在耳。可以推想，裴松之定然是多方考察，证实了孙盛的记述，故而采信的。

同是晋代人的干宝（？-336），在他所著记录古代神话传说、奇闻异事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中，也收录了“王祥剖冰”等十余则孝行故事。关于“王祥剖冰”是这样记载的：

王祥字休征，琅邪人。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潜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

故事框架与《三国志》基本一致，只是记述稍微详细了一些，增加了黄雀入幕的事。

《搜神记》中的故事，并非作者闭门臆造，而是记录民间传说、异闻所得。据此可以断定，王祥的孝行故事，在晋代甚或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已在社会上广泛流行。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著，梁刘孝标注，记载汉末、三国及两晋士族轶事遗闻的《世说新语·德行》，也载有王祥求鱼的故事：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晋阳秋》曰：“后母数潜祥，屡以非礼使祥，弟览辄与祥俱。又虐使祥妇，览妻亦趋而共之。母患之乃止。方盛寒冰冻，母欲生鱼，祥解衣将剖冰求之，会有处冰小解，鱼出。”萧广济《孝子传》曰：“祥后母忽欲黄雀炙，祥念难卒致。须臾，有数十黄雀飞入其幕。母之所须，必自奔走，无不得焉。其诚至如此。”家有一柰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萧广济《孝子传》曰：“祥后母庭中有李，始结子，使祥昼视鸟雀，夜则趋鼠。一夜风雨大至，祥抱泣至晓。母见之惻然。”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世说新语》毕竟是笔记、小说，记述相对详尽，且绘声绘形。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旁征博引，将王祥“剖冰求鱼”、“黄雀入幕”、“风雨守柰”三桩孝行，汇集一体，为后世流传，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版本。

唐初纂修的《晋书》亦有记载：

……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潜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

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

与《搜神记》比对，除多出“风雨守柰”一则外，其余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可知《晋书》袭自《搜神记》。以传说入史，似不够严肃，往往遭人诟病。然而考虑到《晋书》“好怪力乱神之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代类书《初学记》同样有关于王祥故事的记载，内容引自南朝刘宋时期师觉授的《孝子传》，说：“王祥少有德行，失母，后母憎而潜之，祥孝弥谨。盛寒河冰，网罟不施，母欲得生鱼。祥解褐扣冰求之。忽冰少开，有双鲤出游，祥垂纶获之而归。人谓之至孝所致也。”

同样是《初学记》，在卷七《地部·冰》中，引南齐臧荣绪所著《晋书》文曰：“（王祥）后母朱氏思生鱼，于时河水冰坚，祥朝朝冒厉风于涯伺鱼，一朝忽冰开小穴，有双鲤跃出。”

基本情节是一样的，只是过程叙述得更细腻，有所铺陈，而且少神怪意味，更加符合人情事理，更加容易使人相信。

以“剖冰求鱼”为主要内容的王祥孝行故事，就这样在民间广泛流传着，被各种典籍记载着，一直到盛唐时代。

## 故事变异

至北宋初年，各种史籍对“求鱼”故事的记载，已发生了变异。太平兴国（公元976—983年）年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载有“王祥池”一项，记其位置在“望江（今安徽安庆望江）县西南二十里，即（王祥）卧冰求鱼处也”。所述地望江是对是错姑且不论，流传了近千年的“剖（叩）冰”，在这里已经变为“卧冰”了。

稍后，陈师道的《后山谈丛》说得更为直白、真切：“世传王祥卧冰求鱼以养母。至今沂水岁寒冰厚，独祥卧处，阙而不合。”

说的就像是亲眼看到了，其实不然，把孝河（未知古时名称，姑且以今名呼之）说成沂水，早已露了马脚。可知纯是道听途说！

南宋潘自牧编订的《记纂渊海》引《孝子传》说：“王祥事继母至孝，母疾思食鱼，时冬月，冰坚不可得。祥解衣卧冰上，少时冰开，双鲤跃出。”

从此，“卧冰求鲤”便取代了“剖（叩）冰求鱼”，在社会上广泛流布，并且堂而皇之走进了历代各类史籍、文书和民间记忆。比如，宋代以后墓葬中有关孝行故事的壁画，大多有王祥卧冰的内容。

至于“剖冰”与“卧冰”孰是孰非，专家学者也有论定。古文献学、目录学大家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就提出了质疑：

……按解衣者将用力击开冰冻，冬月衣厚，不用力也。非必裸至赤体，俗传为卧冰，无此事也。”

对于《记纂渊海》所引《孝子传》，余先生则说：

此所引《孝子传》，不知何家（笔者按：《孝子传》版本众多，仅六朝时成书者就有十几种，后来绝大多数已亡佚，所引难以考求，故不知何家）。卧冰之说，盖始于此。则其传说，亦已久矣。

讹传从何而来？有专家考证，是从《搜神记》中的《楚僚（樊僚）卧冰》嫁接过来。楚僚故事记述，他事后母至孝。母患痼疾，须用鲤鱼治疗，此时正值十二月，河封冰冻。

“僚乃仰天叹泣，脱衣上冰卧之。有一童子决僚卧处，冰忽自开，一双鲤鱼跃出。……此与王祥、王延事同。”



论者以为，是后人为了使王祥孝行更加眩人耳目，更具感染力，把楚僚（樊儵）卧冰的行为嫁接给了王祥，此后便以讹传讹，弄假成真了。

至于嫁接的年代，有学者研究，认定是在五代至宋初一段时间。首先把王祥剖冰写做卧冰的是佛经“变文”。变文是唐代一种说唱文学的名称。起初是指寺院为宣讲教义，用佛经或民间故事编创的说唱底本，因为内容、形式都有所变异故名。经明清到现世，成为“鼓儿词”。变文多由寺院里的俗讲僧说唱表演，用以教化度人。

包含有大量变文的敦煌文献中，记载关于“王祥卧冰”孝行故事，不止一处。写于五代时期的《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二）》文书有：“泣竹卧冰也不及，百年侍养莫交亏”的词句。“泣竹”应指孟宗，“卧冰”当是王祥，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文献中，关于王祥“卧冰”事迹最早的记载。

《父母恩重经》又称《报恩经》，全名《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姚秦时期的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被誉为佛教的“孝经”，“母爱的颂歌”。其主要内容为，佛陀以“怀胎守护”、“临产受苦”、“哺乳养育”、“远行忆念”等十项内容，为阿难等众弟子讲述“父母恩德，无量无边，不孝之愆，卒难陈报”，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各发誓言，信受奉行的经卷。此经原本不含中国内地故事，孟宗、王祥等孝行记述，是改编成变文时加进去的。

佛经中引入中原世俗内容，有其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自从汉明帝夜梦金人，派遣使臣求取佛法、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和中原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交涉、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原因是佛教秉持的禁欲修习、轮回业报和极其浓厚的厌世、出世思想，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君报国，入世、治世理念，几乎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尽管总的说来，佛教在中原一直呈现一种发展的态势，但也不时受到挑战与攻讦，有时还会遭遇灭顶之灾。如南北朝时期，周武帝就曾以教唆民众、浪费资财、悖逆不孝等罪名，在全境损毁佛塔，焚烧经典，强令三百多万僧众还俗，并将众多佛寺赐予王公充当私第。唐武宗更以“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为名，下令灭佛。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责令二十六万余僧尼还俗，没收庙产良田数千万顷。为了生存与发展，佛教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把他们所提倡的普度众生，转为忠君报国；将其善恶标准，定为忠孝仁义；把依附儒家作为基本观念等，加快了世俗化、儒学化的进程。王祥孝行故事被纳入变文，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产物。

本来，把“剖冰求鱼”编入变文，完全可以照抄照转，为什么改成了“卧冰求鱼”呢？这既不是误写，也不是信手而为，而是有着佛教自己的理念渊源的。仅举《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中的例证，就足以鉴定此说不诬。此经中记述，如来曾以八种深重梵音，告诸大众，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报答父母深恩。如：

其一曰：“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没踝，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其二曰：“假使有人，遭饥馑劫，为于爹娘，尽其己身，齑割碎坏，犹如微尘，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其五曰：“假使有人，为于爹娘，百千刀戟，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以上述标准衡量“剖冰求鱼”的行为，会立即感到是多么的轻如纤毫，多么的微不足道。考虑到要遵从佛的教导，要感动众生，教化四方，在变文中将“楚僚（樊儵）”的事迹嫁接到王祥身上，把“剖冰”改为“卧冰”，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记述王祥卧冰求鱼孝行故事的佛经变文，除了《报恩经》，还有许多。如《故园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就有：“万代史书歌舜主，千年人口赞王祥。泣竹笋生名最重，卧冰鱼跃义难量”的内容。可以说明，“卧冰”之说，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逐渐定型。



至宋真宗时的官修类书《册府元龟》，也径直将王祥故事改为“卧冰”。官方认可了，文人墨客便争相跟进，此后的许多诗文也大都将求鱼故事，书写为“卧冰”了。

佛教的宣扬，使“卧冰”传遍千家万户，走入百姓心灵；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令故事成为孝行经典，王祥也被推崇为天下无二的楷模。这种情形从宋初开始，直到民国，如缕不绝。有元代郭居敬编撰的《二十四孝诗》以及后来官、民编辑印行的众多《二十四孝图说》为证。笔者手头正好有一册初刊于同治七年的《二十四孝图说合刊》，文图并茂，除有郭居敬原诗及序外，并有试律一首，颇可玩味。兹摘录其中“王祥卧冰”一则，与读者诸君共享。

王祥卧冰 得冰字

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一片卧冰模。

晋王祥，字休徵，早丧母。继母朱氏不慈，父前数譖祥，由是失爱于父。母尝欲食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归供母。乡里惊叹为孝感所致。

老母思鱼脍。天寒购未能。钓殊江上雪。卧破沼中冰。丙穴泉皆涸。丁沽水亦凝。赤身风力劲。坦腹月华澄。暖透薄三尺。明开镜一层。寸心金共贯。纤尾玉双升。好进堂前箸。非张岸下罾。王祥隆孝养。贤俊喜同登。

### 故事释读

王祥孝行定于一尊，“卧冰”得到广泛认可，似乎一切都解决了，其实不然，在“卧冰求鱼”流传的千余年里，由于释读的不同，质疑之声仍不时出现。个别时段还曾经遇到过不小的麻烦。比如，《二十四孝诗》的编撰者郭居敬所在的元代，就曾明令禁止割股、埋儿、卧冰等行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提倡全忠全孝，并以“孝子皇帝”自称，却对卧冰求鲤等行为提出质疑，并下令禁绝。洪武二十七年，山东守臣报告：日照有民江伯儿者，母病，割胁为之医治，不愈，遂向泰山神许愿，如母病愈，即杀子祭祀还愿。后母病竟痊愈，果将三岁幼子杀死。朱元璋闻听，勃然大怒，着将此人立即逮捕，杖责一百，发配海南。复诏令天下，民间有此类行为者，一概不予旌表；对危及他人（埋儿杀子之类）的极端行为，当严加制裁。后又以“割股卧冰，伤生有禁”为由，下令将卧冰求鲤等从二十四孝中剔除。

进入近现代以来，对于包括卧冰求鲤在内的二十四孝，依然争议不断。“文革”中更被视为封建糟粕，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传统文化的复苏，卧冰求鲤等二十四孝，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但评价却冰火两重天。肯定者，将其印制成图书、挂历，绘成精美图画，广为散发，四处张贴，视为进行孝行教育不可多得的教材；批判者，判定它内容虚假荒谬，血腥残忍，宣扬愚孝，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应予彻底否定。

诚然，二十四孝中的确有一些夸大的、不科学的、带有怪异、愚昧色彩的内容，但究竟应当如何理解、释读，众多的专家给出了丰富的答案。其要者为：

一是要避免用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二十四孝”。作为一种用于教化的工具（书籍、图画或其他样式），其中的故事，不必非得是写实的，记录真人真事的，也可以是寓言或者神话式的。如同毛泽东主席教育、激励人，曾经引用过的“愚公移山”，谁也不会要求愚公祖孙几代，家乡居住，姓字名谁，必须有史可考，有据可查，否则就认为是荒谬的，就否定其教育意义。相反，人们对其真实性忽略不计，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那种自力更生，挖山不止的韧性战斗精神上，并引以为克服困难，创业奋进的动力。

其次，学习二十四孝，目的是学习古人的孝行精神，弘扬中华孝道文化，养成敬亲养



老的社会风尚，而不是让人们亦步亦趋，照搬照转，刻意模仿他们的行为。就像我们学习张思德、焦裕禄一样，学习的是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是非得要为烧木炭而牺牲，非得栽泡桐、治沙荒不可。同理，今天蚊蝇影响了父母睡眠，只须给买来蚊香或安装驱蚊器即可，而绝不会有人再去模仿“吴猛恣蚊”；父母想要吃鱼，就去市场买来，任谁也不可能去学“王祥卧冰”。有人担心，宣扬二十四孝，可能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这种忧虑也是多余的。如今科学昌明，民智大开，特别是青少年，睿智成熟的程度，明辨是非的能力，比起古代真有天壤之别。他们知道哪些行为可学，哪些只是寓理于事的神话、寓言，更加有学校师长的教诲，社会舆论的引导，至今还没有一例，因机械模仿二十四孝发生的事故。

我们既已厘清从“王祥剖冰”到“卧冰求鲤”的嬗变过程，自应对其有一个辩证的、科学的判定，如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正确引导，那么，包括“卧冰求鲤”在内的“二十四孝”，对于宣化孝道，养成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 抗大与沂蒙根据地的冬学

刘中堂

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学校的专用名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挺进山东敌后，在培养了大批抗日军政干部的同时，利用冬闲季节开办学校，组织群众到学校认字、学文化、学唱歌。通过学习，群众明白了许多抗日的道理，不但扔掉了文盲帽子，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不少人还当起了老师，使抗大的办学理念、抗大精神得以代代相传。费县薛庄镇谭家庄村91岁的宋兴东便是其中之一。

据抗大一分校政治教员白彦回忆：抗大处于敌后日、伪、顽的包围和严酷战争环境之中，只有依靠群众，紧密与群众联系，才能在敌后非常复杂的条件下生存发展，克服困难，战胜敌人，顺利地完教育计划和建设各级政权的任务。处于敌后的抗大是一所流动性的学校，一年几乎一半时间是在战斗行军转移路上度过的。右肩背着步枪、手榴弹，左肩挎着书包，到处都是校舍，战场也是课堂。抗大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学群一体，军民一家，喜群众之所喜，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休戚与共，存亡相依。

敌后的抗大实际上也是一支强大的工作队，分别建立了坚强的民运工作队、文工团，专门帮助地方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减租减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抗大全体教职员毫无例外地都做群众工作，群众需要抗大帮助什么就帮助什么。当春耕、夏收夏种、秋收农忙季节，抗大从校首长到学员和群众一起劳动在田野上，边干活边拉呱儿，宣传抗日道理。冬闲就为群众兴办冬学、识字班扫盲、辅导文娱活动，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大娘会、儿童团，适时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在此基础上，动员参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宋兴东对笔者讲：当时为了引导人们积极参学习，抗大文工团还在他们村书写了多幅大标语，演出文艺节目，把识字的好处编成歌曲教大家唱，调动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和他一起到学校学习的就有苏继祥、李玉生等20余人，这首歌他们至今还会唱。通过60多天的学习，能认会写200余字，不但不当睁眼瞎了，还在村里当起了先生，当时的高兴劲就别提了。

宋兴东说：自己9岁时父亲就病故了，19岁了连个名字也没有。1940年春节刚过，庄里住上了八路军。这些八路军除帮他们挑水、扫院子、干农活外，还办起了学校，免费教穷苦人认字、算数。他去学校报名，八路老师（后来知道他就是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团长袁成隆）问叫什么名字，他说父亲死得早，没人给起名。老师问了他叔伯哥叫什么名字后，便给他起名叫宋兴华。叫了一段时间，邻居都说这样穷，还起了一个“叫花子”（要饭的代号）的名字，不吉利。宋兴东找到袁老师说明情况，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说：人们都误解了，你的名字是振兴中华的“华”，不是叫花子的“花”。老师沉思了一会：尊重你们的意见，那就改名叫宋兴东吧，我们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等打败小日本，我们一定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东方的文明强国。



抗大一分校文工团与115师战士剧社在临沭合影

抗大文工团团长袁成隆大学毕业后参加抗日工作，由于他学问高，平易近人，为文工团员及驻地青少年起名字的例子很多，特别是为两个团员起名的故事至今还在沂蒙山区流传。刘知侠（《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原名刘痴侠，一次，在沂南县东高庄一个山岗的树丛中，大伙正围着袁成隆聊天，袁成隆笑着对“痴侠”说：“把你那个病字头去掉，叫知侠好吗？”知侠当即欣然接受，大家也为之鼓掌叫好，从此刘痴侠便改为知侠这个名字，此后他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是署名知侠。文工团由晋东南挺进山东后，袁团长决定成立舞蹈组，团里又增加了几名小同志，刚进团的一个小赵，只有小名，没有正式名字。一天，他叫住小赵，对他说：“我看你人很忠厚，你就叫赵忠实吧！”2012年5月4日，笔者同费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孙百京、大青山党性教育基地筹建处主任周传文等去北京采访原抗大文工团团员、曾任国务院某部政治部主任的赵忠实，赵老提起袁团长为他起名一事，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袁成隆给宋兴东起了名字后，还多次到他家中走访，问寒问暖。这对贫穷的宋兴东是个莫大的鼓舞，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不久被推选为庄里的指导员。随后和民兵连长宋德余、公安员宋兴法一起去马家窑参加爆破培训班。由于日军即将对我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新一轮的大扫荡，抗大一分校要转移到外地，抗大文工团领导便指定刚脱盲的宋兴东、苏继祥、李玉生兼任冬学的老师，鼓励他们一定把冬学办下去。

宋兴东等人教的学生主要有：戚建运（济南邮电局退休）、宋兴祥、李德和、刘成才、刘成文等30多人。后来，在戚建运等人的启蒙教育下，戚兴连、刘成坤、周茂宇、徐大方等近百人入校学习。

抗大一分校在敌后办学七年，六年在山东，对山东的贡献巨大：一是培养干部2.4万余名，二是对日军作战达数百次，仅发生在1941年冬的大青山突围战，抗大学员为掩护山东党政军机关人员突围，就献出了200多年轻宝贵的生命；三是建设抗日根据地政权，抗大走到哪里，就把建设政权的工作做到哪里；四是对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文化建设，水平既高且丰富多彩。特别是利用冬闲季节办学校，不但使根据地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脱了盲，而且还为根据地人民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教师，使抗大的教风、学风、优良传统在沂蒙山区世代相传，抗大的旗帜在沂蒙山区高高飘扬。



#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 如意斋门前变刑场 福义隆无端遭大劫

抗战前临沂城的工商业甚是艰难，军阀横行，土匪为害尤甚，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老城的南门里大街是当时最繁华的去处，两旁商店林立，于是就成了军阀敲诈的目标。

井神楼附近有两家最大的鞋店和服装店。鞋店名如意斋，经理范万清本是一个儒商，一向奉公守法，却不时被兵痞敲诈。一旦不能满足军阀翟文林的兵痞，就会招来祸事。这天，这些兵痞押解了十个犯人，行至如意斋鞋店时突然停了下来，说是每人要一双鞋穿上好上路。结果是这双不适，那双也不行，兵痞们直到将满货架的鞋全部试完。这还不算完，他们声称“犯人要在里西天”，就将十个犯人在店前杀了。立时满地是血，人头乱滚。事后还要店主出钱雇人收尸清除血迹。如意斋一连数日无法开门营业，损失千元以上。此后，整个大街上的店铺都害了怕，每逢处决犯人时都提前关门免遭祸事。



民国时期处决罪犯



清时东岳庙会

无独有偶。不久后又发生了军阀李占彪的一场敲诈案。如意斋鞋店的邻居是福义隆服装店。这家服装店的经理是戴佑臣，此人是有名的忠厚长者，一个爱国的工商业者。抗日战争时他把自己在农民银行的资金全部转交给了八路军的北海银行，解放后一直担任县政协委员直到去世。

当时李占彪向他敲诈大洋五千。戴佑臣全部资金也没有这么多，只答应给他一千。结果祸事就来了。这年初冬李占彪的后勤部让福义隆给他们做棉衣一千套，谁知交货三天后突然来了几个兵痞将店主抓去，罪名是棉衣内用了旧棉花。结果棉衣全部退回还被罚款两千。福义隆从此难以为继，只能倒闭了。

### 东岳庙妇女赶会 蟠桃宫丐帮进香

临沂城最大的山会是旧历三月二十五的教场会，到二十七再转移到西关的东岳庙会，因为传说三月二十八是东岳大帝的生日。这时教场会时骡马、百货的交易已基本完成，故大的客商便离去了，东岳庙会上买卖的商品多是妇女制做和所用的小商品，因此赶会的人多是妇女，还有一些到东岳庙烧香还愿的妇女。

二十八是正会，但二十七就开始了，也是昼夜通明。庙中更是热闹：大殿中道士接连不断地“打蘸”诵经，东西配殿和东西廊房内巫婆神汉组成的“皇经会”诵念经文，道教称他们为“道末子”，即是道教的末流的意思。

更有一处热闹去处那就是大银杏树下的“存银”的活动。迷信的人传说人可以生前向阴间存钱，死后即可支取使用。因此一些老年妇女便用一小红席笼装满金银箔制的元宝，再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住址，向道士交上存钱手续费。道士就将她的名字写在库上，然后装入一个纸库中，等装满一库时即由道士诵经点火烧库。三天庙会也不知烧了多少库，只知庙会结束后将库灰卖给锡店一次能炼出五百斤纯锡。可见当时的迷信之风是多么的盛行。

庙外这时是人山人海，因夏季即将到来，卖凉席的、卖席夹子和卖蓑衣的特别多，麦收时的农具也是热卖。最热闹的去处还是大戏台上的演出，内容多数是戏班演出的京剧。当然也有不良现象，那就是各妓院的妓女都来坐在黄包车上听戏，名为听戏实则是到处招摇。范筑先任县长后就把这种现象制止了。

因为这东岳庙会赶会的是多妇女，故又称“妈妈子会”。而1949年春天的庙会则成为了最后一次庙会。

东岳庙会还有一个热闹的场景。那就是三月二十九下午五点左右庙会快要结束时赶会的残疾人举行的一次集体进香活动。这些人有组织地排起长队，最前面的是“红山会”

的成员，这“红山会”又称“鬲破头”，他们敲打着刀子捧香在前；接着是“明邦”，这“明邦”全是盲人，他们边走边弹着三弦、拉着盲琴；后面是说“莲花落”、“数来宝”和说“武老二”的……，各帮皆打着他们的乐器，如竹板、梨花筒（犁铧）、牛胛骨……

他们进庙后先拜东岳大帝，然后去蟠桃宫。这蟠桃宫是东岳庙的东配殿，内供王母、斗母、金母，两侧供八仙。原来这八仙中有个铁拐李，他是残疾人的保护神。到殿后焚香礼拜放鞭炮，还请道士给打“谢恩蘸”，向庙里捐香火钱。

至此庙会就基本结束了。不过当晚远路未走的香客还留在庙内，庙中还有皮影戏表演，至午夜方散。

## 去偶像寺庙变学堂 妥安置僧道当校工

临沂城自“戊戌变法”后废除了科举制，旧的儒学皆改为学堂，但由于校舍和师资问题，只是将考院、书院、黉学等国家的教育机构改为校舍外，新式的学堂一直很难兴办。自从1902年办学堂开始，实行的是“以经学根底抵重”外增加了一些现代教育内容。其行政机构称“劝学所”，借用寺庙做为校舍，因此形成了庙学同院的局面。

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伐军来到后，才开始有了转机。首先由各社会团体发起拉掉各寺庙的偶像（只保留了孔庙、五贤祠、右军祠、关帝庙等纪念祠庙），将有文物价值的造像存放于万善庵。像僧格林沁、陈国瑞等的泥像皆废掉，然后将这些寺庙改造成了学校。一些教育界的知名人如李光仪、夏侯先、韩德一等人起了带头作用。临沂最大的寺庙广济寺改为省立三乡师的校院，朝阳寺改为第一小学，衍庆庵改为第二小学，孔庙内为第三小学，文昌宫为第四小学，南关关帝庙为师范附小，城隍庙为职业学校，其他北关龙王庙、西关蚂蚱庙、东关关帝庙、南关给孤庵和三皇庙等皆改为小学校舍。一时间城关内外办起了十八处小学。将普照寺、广生宫、玉皇阁、僧王庙等庙址划归省立五中为校舍。这一举措大大地解决了多年来办学无校舍的困境。这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特别是一些僧道尼姑到处奔走诉说，一时谣言四起。

政府为了安置这些僧道，做了几条规定：一、原来的护庙田仍由原僧道作为生活来源；二、寺庙的原僧道住房仍归僧道所有，如学校需用时可给另建住房（如衍庆庵的尼姑方慧就在北关给她另建了住房，广济寺的僧众也在庙外另建了一处住房）；三、无护庙田收入的僧道可留校当校工，发给工资享受职工待遇。所以当时不少年轻的僧道皆自愿当了校工，负责烧水、打铃等杂务工作，衍庆庵的年轻尼姑也留校给女生服务。临沂寺庙办学校给僧道妥善安置的经验还受到了表扬。这种局面维持了不久，日本侵略军占领临沂后，整个教育被日伪摧残，教育事业沦为奴化教育了。

## 居民用水话古井 夏天降温靠冰窖

临沂古城在明泾王开挖北洙河前，人们饮水一般要到沭河和沂河去运，而大多数人用城内的井水。古城金朝建土城墙、明初改建砖城墙时，挖了不少水井。

这些水井最著名的有如下几眼：城东北平野台边的平野井。此井还出土过元朝的石碑，足见此井之古，至今还保留了一块清同治六年（1867年）修井的碑记。再就是独一无二的双口井。此井在城西南隅的双井口巷，井北侧有一明代的古庙准提庵，庙门东墙上有一修井的石碑。碑文记载此井自明代即有，因井口太大（直径2米）为汲水人的安全考虑，乾隆年间在井口上履了两块巨石，中间留两个井口，可以两人同时汲水，这就是有名的双井口。此井2003年被埋，结束了它的使命。再一口井就是井神楼井。它位于沂州路的中段，向西正对着考棚街，因井上建有阁楼故称井神楼子，楼上实际上供的是关公。这眼



临沂南关  
清真寺

井在楼下，墙上有一石碑，是修阁楼的碑记，记载了此井自明代即有。民间传说“此井直通小涑河的老崖头，放进一只鸭子可从老崖头游出”。这当然是传说，实际上是不通的。

“文革”破四旧时井神楼被拆，此井也被填死了。

还有几眼井水可以饮用，故称“甜水井”。如东南隅的魁星阁汪西岸的井。其西旁一巷名挑水巷，可见当年居民多经此巷前去汲水。西南隅的火神庙汪东岸的小西井以及其西边不远处的狄家大园井。南关可饮用水井有阁子门外东南方向的井，在原146医院门前。还有原老师范门东的一井。清真寺内有一清同治元年（1862年）开挖的井，并有清真寺甘泉井碑记，至今井与碑皆在。

还有一奇特之井在原北门里路东天主教北堂内。院东是一菜园，园内一井为明代古井，井的最下部是古桥孔，可见此井之古老。城内出水最苦的井是朝阳寺街北端的井，人称碱水井，其巷即称碱水井巷。此外许多菜园也皆有井，多用于浇菜之用。私有井者多在花园，像马家花园、钱家花园、教堂花园、狄家花园、胡家花园等。当然这些井现在皆不存在了。

夏天古城的居民们是如何解暑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水井。夏季井水是凉的，卖肉的到下午将卖不了的肉吊在井中，可保不坏；卖凉粉等冷食的也要用井水降温。当然最好的是用冰块，但当时是无法制冰的，只有冬季在河内取冰放在冰窖内保存。这冰窖在哪里呢？它就在老东门外东关北小涑河的河岸上不远处。一般是到最冷时冰厚一尺时就就近在涑河取冰，放入冰窖利用自然的地温，可使冰保存至夏季。1924年美国医院用电可制冰后，东关冰窖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其遗址尚存。这也是临沂城过去用冰的一段历史见证。

### 各行业各祀其神 众僧道同奏一曲

过去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各行各道，各有各的行会，各有各的祖师。清人纪晓岚曾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所论及。但临沂又有临沂风俗，现将各行业的祖师开列如下：

被服业师黄帝，丝绸布匹业师嫫祖，鞋业师孙臧，红炉业（包括铁、铜、锡、金、银等）师老子，木匠泥瓦工师鲁班。饮食服务业敬灶神，屠宰业敬樊哙，胥吏敬曹参，盲





民国初年临沂  
城一角，中间  
为寺庙

人敬师旷，乞丐敬铁拐李，戏班敬唐明皇，药店敬孙思邈，中医敬神农，船户敬天后（妈祖），吹鼓手敬张良，酒店敬杜康，长随敬锺三郎，肉食店敬张飞，粮店敬关公，钱店敬善财，镖局敬武松，律师萧何，陶瓷敬舜帝，画工（包括扎彩匠）敬吴道子，说书艺人敬张果老，占卜业敬鬼谷子，相面业敬麻衣老祖，旅店敬孟尝君，纸店敬蔡伦，刽子敬李逵，土匪敬宋江，妓女敬管仲……。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各祀其神，各有各的行会和聚会的地点及日期，如厨师是正月初一到朝阳寺去祭灶神，三月十五木工泥瓦工到衍庆庵祭鲁班，六月初一到普照寺老君堂去祭老子的是红炉业，屠宰业是五月十三到三义庙去祭张飞……。没有庙的也要约定日期到指定地点去祭祀。不过最普遍的是各商店均敬财神，而财神又分文财神比干、武财神赵公明。当然最受尊敬的还是军管财神关公，而且皆在正月初五祭关公。古代商业街的财神自然就是井神楼上的关公，享受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的香火。

旧时的老城虽然寺庙林立，但是佛道两教却是非常和谐，互相尊重，甚是融洽。居民则是佛道并尊，既敬道又尊佛，对道士和僧人也是同样尊重，因此佛道的寺庙中既有佛像又有神像。像普照寺既有大雄殿又有老君殿，佑德宫前殿是三清，后殿就是观音。广济寺有六座大殿：天王殿、大雄殿、观音殿、地藏殿、王母殿、碧霞元君殿，是佛四道二的寺庙。火神庙前殿是火神、后殿是观音，而且一直由僧人住持。佛教会也曾设在此庙。朝阳寺有大雄殿、天王殿、灶神殿、财神殿，也是佛道合一的寺庙。当然居民一般是既信佛又信道，特别是有人死后做超渡时，一定要僧道对棚，既请僧又请道，同时举行法事，两台同时“放焰口”。更奇特的是僧道还使用同样的乐器，演奏相同的曲调，他们的乐器有笙、管、笛、箫、排箫、云锣、钹、法铃、手鼓、埙、月琴、三弦、四胡……一般是八僧八道，还有十六僧十六道的，但皆是演奏同一曲调。这些乐器佛教是存放广济寺，道教存放在万寿宫和东岳庙。他们最后的一次大合奏是1946年罗炳辉出大殡时，从此再也没有搞过大合奏。只是1947年和尚在广济寺搞过一次法会，1949年正月东岳庙道士又搞过一次法会，从此就成了绝响。

# 我国现存最早的墓碑 ——平邑鹿孝禹碑

林清伟



平邑鹿孝禹碑

平邑鹿孝禹碑，出土于平邑县原平邑集附近，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是迄今我国现存最早的墓碑。又称鹿孝禹刻石、河平刻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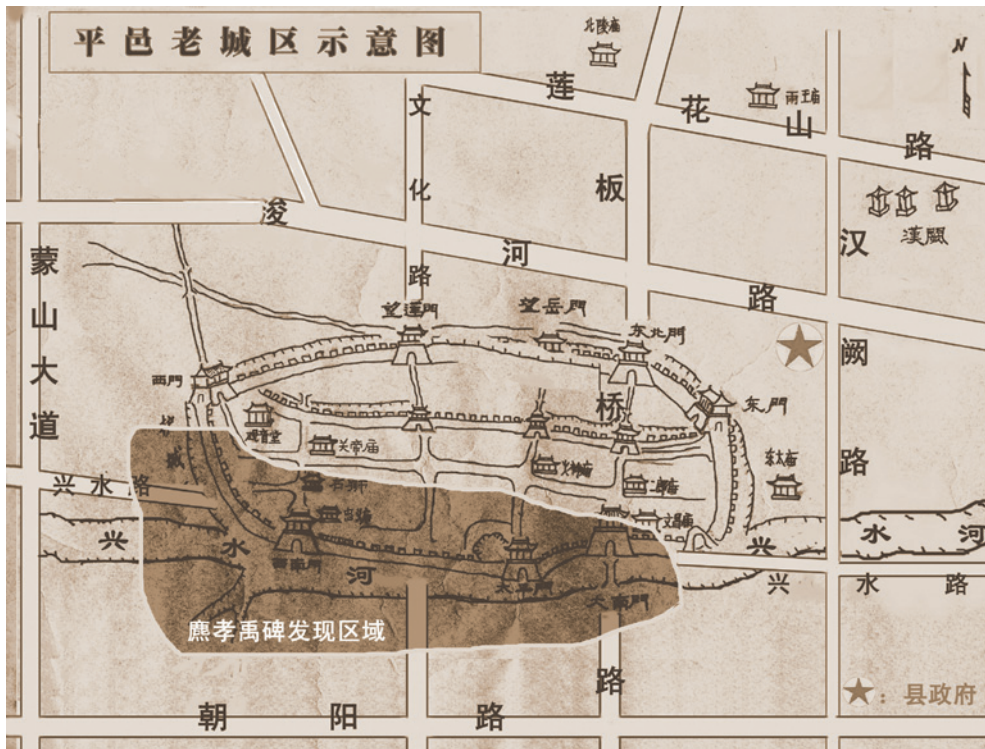
据《齐鲁晚报》报道，2011年3月，省文物局主持举办了山东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评选活动。活动先由文物专家学者从博物馆内13万余件藏品中选出30件代表性文物精品，作为“十大镇馆之宝”的候选名单。在这30件代表性精品中，平邑鹿孝禹碑名列其中。

碑是多以石质为材料并在上面刻着文字或图画，树起来作为纪念或标记的物体。说起碑来，秦汉以前早已有之，只是先秦的碑与后世的碑碣不同。据《史记》其他文献记载，先秦古碑当时多称刻石，并非立于墓葬之前，而是立于宫殿、庙宇之前。立于宫殿之前的谓之“宫碑”，是古人用于识日影、引阴阳的，也称“日晷”。立于庙宇之前两旁的，谓之“庙碑”，多是栓系马匹用的。

考古界专家认为，从目前已发现、发掘的墓葬看，先秦以前的墓葬地面以上一般不封不树，自秦始皇后才出现对墓葬聚土成冢，王侯将相的封土较大，平民百姓的封土较小或不封，而至今尚未发现立有先秦墓碑的墓冢，史料上更无记载。

到西汉后期，出现了立于墓葬前的用于记述墓主人生平、功德的刻石，此类刻石后称石碑，谓之“墓碑”。此“碑”者，被也，原本系丧葬时所设，施轳辘以绳被其上，用以引棺下葬的。或曰：“碑”者，悲也，是引以怀念墓主人功德的。“死有功业，生有德政者，皆碑之”。后来，有有心人在棺木封土后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等勒于其上，移立于墓前，后人在祭祀墓主人时就可以知其生平或功德了。到唐代，树碑立传成风，碑的造型、琢工、篆额、撰文人和书丹人及题款等，开始形成定制，“墓碑”最终成为现今的模样。

浩如烟海的古代石刻碑碣，是后代金石研究的物质基础，是用来补



史、证史，研究古代书法、雕刻艺术和文学历史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

目前，我国现存西汉墓碑极少。在已发现的墓碑中，平邑县的鹿孝禹碑是年代最早的一个，也是著名的汉代画像石刻。有着重大的历史研究价值，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

此碑刻于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碑高147厘米，宽45厘米。圆形碑首，上刻粗花纹屋形，下有两鸟相对，左为鹤，右已泐，均阴刻。碑文隶书，2行15字，有界栏。右行刻“河平三年八月丁亥”8字，左行刻“平邑成里鹿孝禹”7字。

从碑文上看不出鹿孝禹的生平事迹，但可知平邑集是其居住之地，逝后葬于该处，墓碑立于“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即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

专家考证，从已发现的西汉墓碑中可以看出，该碑刻立于汉碑初兴之时，墓碑的定制尚未形成，因此该碑的形制、书丹、绘画等别具一格。

考古及书法界的专家学者认为：鹿孝禹碑的书法风格道劲苍古，可为古隶之代表。

鹿孝禹碑最早被发现并引起文物收藏者的高度重视始于清同治年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时任泗水县知县的扬州人宫本昂在一次走访平邑集时发现该碑（发现位置一说在原平邑集南，一说在今县城城西）。该碑自树起之日距同治九年已过去1896年，距今已2037年了。

此碑出土后，几经易人，传世于今，真可谓饱经沧桑，历尽磨难。自宫本昂发现该碑及其收藏价值的讯息传出后，寻访、拓片、收藏或窃此碑为已有的人纷至沓来。先是宫本昂收藏于学官，后易其弟宫昱手中。后任城人（今济宁）刘恩瀛又于平邑访得。几经辗转，又归属于南海李山农，深藏于济南城东流水街李氏汉石园内。1920年又现于莒县的庄式如宅院中。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一度失传。建国初期在济南成大汽车行又被发现，再一次引起考古界的轰动和高度重视，并得到精心呵护，转藏于山东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 孝悌临沂

——《二十四孝》探源之七

大荒堂主



砖雕：闻雷泣墓

## （七）闻雷泣墓

《闻雷泣墓》，也称作《王裒泣墓》，讲述的是魏晋时王裒的孝行。列《二十四孝》第十六。

“王裒，字伟元，事亲至孝。母存日，性畏雷。既卒，葬于山林，每遇风雨闻雷，即奔墓所，拜泣告曰：‘裒在此，母勿惧。’隐居教授，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遂三复流涕，后门人至废《蓼莪》之篇。”有诗赞曰：

慈母怕闻雷，冰魂宿夜台。阿香时一震，到墓绕千回。

意思为：王裒侍奉父母尽心尽力，母亲在世的时候，畏惧响雷，逝世后，埋葬在山间林地，每到风起云涌，电闪雷鸣，王裒即刻奔向墓地，跪到在坟前，流着眼泪安慰母亲说：“娘，我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害怕。”他隐居教书，当讲到《诗经》：“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时候，心有感触，泪流不止。从此，他的学生再也不去翻阅《诗经·蓼莪》，以免勾起他悲伤的回忆。



干宝的《搜神记》是现存这个故事的最早版本，内载：“王哀，字伟元，城阳营陵人也。父仪，为文帝所杀。哀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泣着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哀在此。’”

王隐所著《晋书》与干宝的《搜神记》互为彰显：“王哀字伟元。北海人也。……哀少立操尚，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绝异，音声清亮，辞气韶雅。哀痛父不以命终，绝世不仕。立屋墓侧，以教授为务。旦夕常至墓前拜，辄悲号断绝。墓前有一柏树，哀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树色与凡树不同。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劳悴’，未尝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

正史《晋书·孝友传》与上述记载略同。

敦煌《孝子传》所载有诗有文，已具备了《二十四孝》的雏形。

“王哀者，城阳营陵人也。养〔母〕至孝，母后命终，日〔夜〕培坟。坟侧有松柏树，哀若向坟啼哭，〔其树〕为之变色，枯□不同常日。母生在之日，常怕雷声。王哀每闻雷声，即便奔赴墓所告曰：‘哀今在此，愿娘勿惊。’诗曰：

王哀慈母怕雷声，每至春间不得宁，及至百年亡没后，语坟犹怕阿娘惊。

王哀见于正史，其身份不容怀疑。属郝经的《续后汉书》叙述得最为详实，里面称：“王哀，字伟元，郎中令修之孙也。父仪，高亮雅直，为安东将军司马昭司马。东关之败，昭问于众曰：‘近曰之事，谁任其咎？’仪对曰：‘责在元帅。’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引出斩之。哀少立操尚，长八尺四寸，仪状伟异，辞气温雅，博学多能，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于朝也。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庐于墓侧，旦夕于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抚墓曰：‘哀在此。’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为废《蓼莪》之篇。

家贫，躬耕，计口而田，度身而蚕。或欲助之，不听。诸生密为刈麦，哀遂弃之。知旧有致遗者，皆不受。门人为本县所役，告哀求属令，哀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草屨，送所役生到县，门徒随从者十余人。安丘令以为诣己，整衣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因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罢，一县以为耻。

乡人管彦，少有才学而未知名，哀与之友，男女各始生，便共许为婚。彦后为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阳，哀更嫁其女。彦弟馥问哀，哀曰：‘吾薄志毕愿山藪，昔嫁姊妹皆远，吉凶断绝，每以此自誓。今贤兄之子葬父于洛阳，此则京邑之人也，岂吾取友之本意哉！’馥曰：‘嫂，齐人也，当还临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随母还齐！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北海邴春，原之后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负笈游学，乡邑金以为邴原复出。哀以春性险狡慕名，终必不成。其后春果无行，学业不终，有识以此归之。哀常以为人之所行期归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责人所不能哉。

洛阳倾覆，寇贼蜂起，亲族悉欲渡江，哀恋坟垄不去，遂为贼所害。”

以上所述，王哀的籍贯却有二种说法：城阳营陵与北海。如果以正史规范，《晋书·地理志》无北海郡，而《晋书·孝友传》也记叙王哀也为城阳营陵。

《后汉书·郡国志》载，城阳国于东汉刘秀建武年间取消，属县划归琅邪国，属县有：开阳、临沂、阳都、缙、即丘、华、费、东安、蒙阴、东莞、朱虚、营陵、安丘、盖、临朐、剧、广。《晋书·地理志》中说自魏至晋，分北海郡设立城阳郡，莒为其属县，营陵仍归属琅邪，晋司马炎太康年间分琅邪置东莞郡，营陵归属东莞。有魏至晋，城阳没有营陵，营陵不归城阳，成为了历史上的无头公案。而

城阳、东莞郡郡治——沂水则始终属于古琅邪的范围。

所以，乾隆《沂州府志》将王袁归为乡党，树碑立传，说：“魏王袁，字伟元，东莞人，其父仪为司马昭所杀，袁痛父非命，隐居教授，累辟不就，庐墓侧，旦夕拜跪，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母存日畏雷，歿后每雷震，辄至墓曰：“袁在此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为废蓼莪之篇，及司马氏篡魏，袁终身不西向坐，以示不臣于晋。”这里将王袁确定为临沂人，应该还有进一步的资料佐证。

## 小 结

《二十四孝》多用临沂地区的故事充实完善其内容，有着很强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征。它是当时生产力在其意识形态的必然表现，也是封建王朝维护人权统治的人治工具。

古人讲究先做人，后做事，首先立德，方能立功，立言，人品以孝为首，对自己的老人都不好，如何推及于人，忠君报国，所以从儿童就开始教育，“首孝悌，次见闻。”这是其一。其二，《礼记·祭统》曰：“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孟子·离娄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故作为孝子，对父母的生养死葬和祭祀，乃是孝亲的实际行动，是最起码的孝行。但最根本最大的孝行则是生育子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无偿的劳动力，维持自然经济的循环发展。这是孝子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孝悌是构成儒家思想重要部分。但儒家有着自己认识世界的方法，那就是中庸之道，所以儒家并不提倡过犹不及的孝道。《孔子家语·六本》中记载：“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捶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殛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

孔子原话的大意为：曾参侍奉自己的父亲，为一点小事却不知道保护的生命，等待父亲的暴打，死而不回避。倘若真的死了，那不是陷父亲于不仁不义么？不孝至极！你难道不是天子的臣民吗？杀了天子臣民的人，他该当何罪！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维持封建秩序的纽带。封建帝王极力推崇，但面对荒诞不经的畸形孝悌，封建帝王也有了自己清醒的认识。《明史·孝义传》记载朱元璋朝：“沈德四，直隶华亭人。祖母疾，刲股疗之愈。已而祖父疾，又刲肝作汤进之，亦愈。洪武二十六年，被旌，寻授太常赞礼郎。上元姚金玉、昌平王德儿，亦以刲肝愈母疾，与德四同旌。至二十七年九月，山东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胁肉以疗。不愈，祷岱岳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帝大怒曰：‘父子天伦……今小民无知，灭伦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儿，杖之百，遣戍海南。”朱元璋说：“至卧冰、割股，上古未闻。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丧生，或卧水而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

此事亦见于明代人余继登所著《皇明典故纪闻》一书。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对孝悌的态度，以鲁迅表现得最为激烈。他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说：“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我们说，孝悌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有其合理的内涵，尤其是在关爱社会化、制度化仍有缺憾的今天，它不失为过渡期的替代品。俗语说：“百善孝为先，求心不求迹，求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求迹不求心，求心天下无好人。”只要人心向善，祖国的明天一定将更加人性，宽容，充满着爱。



东莞故城遗址

# 琅邪紫金砚的再发现

徐淑彬 徐 宁

众所周知，米芾与苏东坡二人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的主要成员。他二人因为喜欢当时名贵的紫金砚而留下了千古佳话。

## 一、关于紫金石，紫金砚

许多古代文献记载，用紫金石制砚始于唐，盛于宋，宋之后逐渐湮没。

紫金石形成于距今约4.5—5亿年前的寒武纪，属浅沉积岩。已经在岩石的表面发现三叶虫破碎遗骸化石。岩性是泥质白云质粉晶灰岩，主要矿物成分是方解石，另有铁、锰等不透明矿物及白云石和泥质物。含矿层厚1—2米，紫金石多呈透镜状或扁豆状，单体一般厚5—20厘米。

紫金石是在巨厚的沉积碳酸盐岩系形成过程中，由于先后沉积的物质中铁、锰等含量的不同和化学反应的差异，使紫金石呈紫色或黄褐色不规则条纹，并有不规则的金黄色纹理，故名紫金石。其摩氏硬度为3.5—4.5。色泽呈紫、褐紫、灰紫、酱紫、银灰等变化，嵌有浅黄、浅绿、绿黄、金黄、晕红等色带与色团；纹理大多清晰，少数朦胧，有豆绿色圆眼等。该石质地致密嫩滑，温润如玉，色泽端庄，纹理缭绕，声音清脆，磨光面显油脂光泽。

关于紫金石产地的记载，多见于宋代。高似孙《砚笈》、唐彦猷《砚录》、李之彦《砚谱》均言产地在青州府的临朐县，但《青州府志》、《益都县志》、《临朐县志》都不见记载。宋代书画家米芾在一幅书法作品中写道：“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他还在《砚史》中提到：“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米芾的另一幅书作则记述了他的好友苏东坡喜爱紫金砚的情形：“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这两幅关于紫金砚的书法真迹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三希堂法帖》均有收录。



图1

现存世的两方紫金砚应是唐宋遗物。一方凤字形砚是1972年上半年出土于元大都遗址和义门内后英房。砚长22.7、宽17.5、厚3.9厘米。砚的前部有两足，砚池向后倾斜，砚面有明显的墨痕。出土时已残破，右上角砚池部分缺失。砚背面自右至左竖向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曰：“此琅邪紫金石所□，易得墨，在诸石□□□永□□□，皆以为端，□也。”落款为“元章”二字（图1）。

考此处“元章”应为宋代书画家米芾的字号。米芾（1051—1107），初



名黻，41岁后改为芾，字元章，号襄阳居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等，人称米南宫。祖籍山西太原，后迁至湖北襄阳，晚年居住江苏镇江，亦称吴人，北宋著名书画家。徽宗召为书画学博士，曾官至礼部员外郎。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行草书得力于王献之，用笔俊迈，成就极高。苏轼曾对其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评。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米芾曾著有《米海岳画史》、《米海岳书史》、《砚史》等著作。他和苏东坡一生爱砚，对砚有着较高的研究水平，留下许多玩砚、题研、藏砚的故事。

关于元大都遗址所出的紫金砚，因识者较少，在出土之初曾被当作“紫端石风字砚”（见《考古》1972年第6期），时代一直被认为属“宋代”。笔者认为，这砚的造型明显具有唐、五代风格，应早于宋代。从北宋米芾书作中称其为“传世之物”也可知，这砚的制作年代应早于北宋或米芾生活的时代。不可依米芾题铭时间作为确定该砚的时代依据。1992—1996年间，笔者曾多次去首都博物馆观摹展览中的米芾款紫金砚。该馆在展品的说明文中认为“元章”二字并不一定就是米芾，学术界存在争议。如果他们读了米芾的《砚史》以及上述书作，或许这个问题就不是争议了。将这件出土于元代遗址（后英房主院东挟屋的砖地上）、由宋人题刻的、有可能是唐或五代时期的紫金砚，陈列于元代文化展带上，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另一方紫金砚现存西安碑林，系1957年征集的出土物。砚为长方形，长23、宽15.8、厚2.9厘米。砚面大于砚底，四边内敛。砚堂呈长的八角形，水池底部破损成洞，前、左、右三边亦破损。砚背往上隆起，有铭曰：“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笔者注）造紫金石砚”。绍圣系北宋哲宗赵煦时期第二次改元年号的最后一年。这个时期，正值米芾中年（46岁），是紫金砚盛行阶段。宋代以后，有关紫金砚的情况，不仅不见文献记载，朝野上下，连实物（传世或出土）也不见。估计是“唐时竞取为砚，芒润清响，国初已乏”的缘故。

在前述仅见的两方出土的紫金砚中，带有米芾款的那方，是与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等不同时代文物共存，被认为是元代贵族收藏的文物。这方砚据说



图2



图4



图4



图3

原曾为宋徽宗所有，后赐米芾，又被苏轼借去，苏轼临终前曾嘱其子随葬，被米芾索回。米芾将此砚的流传过程写入《宝晋英光集》。宋代何遵在《春渚记闻》中有一段“米元章捧砚跪请”的文字，说的可能就是这件事。

关于琅邪版图的问题，宋代文人所说的琅邪，实际上是指现在的临沂城（图3）。这个问题，以后将单独讨论。

## 二、琅邪紫金石의再发现

为了发掘山东省的传统砚种，1978年7月在北京举办了鲁砚展。北京的工艺美术家们没有看到紫金砚的影子，纷纷询问原由，山东的治砚家们那时尚未见过紫金砚。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热情提供了1972年元大都遗址出土紫金砚的资料，并让山东的工艺美术家石可先生观看了实物。

展览结束后的当年秋、冬及次年春，石可先生等根据宋代文献的记载，先后三次去益都（今青州）以南诸地探寻紫金砚产地。临朐县是鲁砚名贵品种红丝砚的产地，自唐以降，制砚颇多，传世品不少。据石可先生所著《鲁砚》云：“益都文化界、当地群众都不知有紫金石及其产地。”石先生多次到益都城东南20里附近调查，“都没有探寻到紫金石的下落”。虽找到紫色石夹层，采集标本后经鉴定比较，认为其质粗糙，其色不正，与元大都出土紫金石砚相去太远。

此后，石可等人又根据米芾砚铭到古琅邪南部、今临沂市进行野外调查，曾在费县境内采集到石质较燥的紫色石制砚，亦不理想。总之，石先生及许多工艺美术、制砚工作者们为了探查紫金石的产地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尽管他们最终没有找到产地，但他们的劳动对推动紫金石的寻找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1991年冬，笔者到临沂地区某县从事野外考察，在一条小山沟中发现一种紫色的水成泥岩，认为这种石头可以制砚，顺便采了两块带回临沂，请邻居叶莲品先生给予品评。叶先生是著名制砚艺术家，在叶先生的指导下，笔者等人将紫色石制成砚后，发现是上等的制砚良材，其各项性能都高于山东省已知的砚种。由此，我二人认为这种紫色石有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言唐宋盛行的紫金石。

在随后对这处产地进一步观察中，笔者找到了紫色石的原产地层，并发现一处古代采石地点，即老坑。在此老坑（笔者将其编号为LK1）附近，采集到一些唐、宋、元时期瓷器碎片，可以辨认的器形多为罐类和碗类，应是古代采石工人饮水的器皿。在清理老坑浮土的过程中，找到两枚铜币，一枚为唐代“开元通宝”，另一枚是宋代“大观通宝”。在老坑山坡下约100米处，见有宋代石槨墓数座，是由村民取土后暴露。其中一座系双人合葬双室墓，呈东西向，头向西。笔者首次看到时，北侧室早已被挖空。南侧室西端挡板已被移至一边，内面阴线粗刻有一朵盛开的莲花纹（现遗失）。墓室两边的立板内壁上浅浮雕刻有花瓶、书、砚等文房用品，雕工粗糙。从村民处了解到，该墓室西端曾挖出淡黄釉瓷碗、罐等，并有几枚“宣和通宝”铜币。

从这座石槨合葬墓内出土的瓷器和铜币看，该墓无疑是属北宋时期。此处北宋时期墓群出现在荒山野坡上（在以往的历次文物普查中，该地未见唐



图4



图4



图4

宋时期的村落遗址），引起了笔者的高度重视：依据墓内石刻图案看，当时该地应有民间石刻工匠，而墓的附近恰巧又发现了同期的采石点和瓷片、铜币，决非偶然。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带应与唐宋紫金石的采掘有关。

紫金石产地见于一座无名的小山包上，附近群山环抱。山体由寒武纪厚层状灰岩组成，呈南北长条状，山顶高出山下小溪约60米，隔溪对岸有较高的小山。紫金石的层位出露在山包的东侧中部，其上为晚寒武纪含三叶虫的薄层灰岩，该层位可磨出五彩斑斓的奇石、观赏石。再下为含砾岩的竹叶石，及厚达数百米的石灰岩。紫金石由厚薄不等的数层泥晶灰岩构成，呈东南——西北倾斜出露，岩石倾角 $5^{\circ}-30^{\circ}$ 。薄层者仅1厘米，厚层者则可达40厘米。总的分布是南高北低，时隐时现，但露头尚好。在南北长约百余米的范围内，见有6处（其中老坑一处），成窝状分布，其地质年代均为晚寒武纪。由于山下小溪的存在，对面山坡上相应的高度则不见该层位的出露，应该是小溪所处的地震断裂小构造不均匀运动所致。

2000年以后，笔者向在临沂工作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克唐先生出示了一些自己制做的紫金石砚，刘大师极为高兴，立即墨书一首自作诗《蝶恋花》赠予本书作者，热情帮助设计了几方砚（图2）。

### 三、对于文献记载的紫金砚的考证

如前所述，宋代许多文献记载，紫金石的产地在青州。其实，那里是红丝石的真正产地，而红丝石在唐宋时期就是全国的名砚了。据我们观察，青州—临朐一带现在称作紫金石的石材，只不过是红丝石的不同层位而已。经过检索，自唐宋以来，那个地区并没有出土紫金砚的记录。

在本世纪初，安徽淮南地区声称发现了紫金砚，说是依据米芾的记载，并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一个商标。众所周知，米芾的书法作品或者著作中只说产地是琅邪或右军故里。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淮南不是右军故里，琅邪的范围也到不了那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近几年来，在鲁南临沂市，陆续出土了9件宋代的紫金砚，它们多是实用的砚。文献记载与实物的出土相吻合，证实米芾的说法是对的（图4）。尤其是2005年在临沂城东南方向小皇山发现的明代沂州卫指挥使李瀚等人的墓葬，出土了2件前朝的紫金砚，是国内首次用考古发掘的手段从墓葬里面出土紫金砚的铁证。这是我们迄今已知紫金砚在明代使用的唯一证据（图5）。

在上述发现之前，许多人只是根据过去首都博物馆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2方砚台论述紫金砚尤其是以前者为主。其实，在地质学上，一个地层的发布，往往可能是几十、几百公里。而那些没有地质学常识的人们，往往容易出现“管中窥豹”、“瞎子摸象”的可能。拿一个层位中的一块石头样品，作为标准化石，凡是不符合这个样品的，都不予承认。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同一个地点的岩层，还有上下叠压与分别的现象。而它们的微结构与颜色则有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别。这就像端砚有许多颜色那样，你不可能拿紫端代表全部端砚的颜色，甚至用紫端作标准，否认绿端、黄端、白端的存在一样的道理。



图5



图5



#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续五）

李兴河

## （九）

诗贵有真情实感，游览诗更贵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在古代咏颂蒙山的诗作者中，有些作者虽没有诗坛大家那样的名气，也没有帝王将相那样的地位，但他们游览蒙山也有自己独特的情怀和感受，甚至为蒙山胜境所陶醉，情之所致，时有佳咏，诗味颇浓。





彭勳，江西永丰人，明永乐进士，曾任山东副使。因性情刚直，受到排挤，致仕家居。著有《书传通释》。游览蒙山时写有《颛臾庙》一诗：

蒙山突兀鲁城东，巨石如龟镇上峰。

为问颛臾今有祀，季孙空富过周公。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的第一二句，写蒙山巍峨奇特的景观。蒙山是鲁国的镇山，坐落在鲁城之东，高耸云天，气势雄伟，顶峰巨石如龟，镇守上方。诗的第三四句，写与蒙山相关的人和事。通过对颛臾庙的凭吊，来评价相关的历史人物。凭吊颛臾，赞颂周公，嘲讽季孙，其爱憎之意深蕴于诗中。颛臾，周代封国，风姓，为鲁国附庸，主祭蒙山。故地在蒙山前，现平邑县城东北。蒙山下有蒙祠，古祀蒙神，宋改祀颛臾。明迁祀于蒙阴，修颛臾庙于蒙阴县西南15里处。季孙是春秋鲁国季孙氏，为庄公弟季友之后裔，世为大夫，执鲁国政，贪婪擅权，富有超过周公。季氏欲灭颛臾，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周公，姬姓，名旦，亦称叔旦，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率部东征，平定叛乱。周代的礼乐制度相传都是周公所制订。周公德高望重，深为后世敬仰，正如曹操在《短歌行》诗中所写：“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彭勳在诗中指出：主祭蒙山的颛臾，千年之后，尚有庙宇供人们祭祀，而当年贪婪擅权、富过周公的季孙氏如今却什么也没有了。对季孙氏的嘲讽鞭挞之意尽在不言中。

王之翰，号宪字，蒙阴人，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进士，先后任兴山、常熟等县知县。为官兴利除害，爱士恤民，因触犯当道，辞官归田。后征用兵部主事，不赴任，屏绝人事，徜徉山水以寄情。著有《金丹妙诀》、《别墅集》。归家后有诗作《致仕归蒙山别墅》：

小筑茅庵近水开，沙边鸥鸟共徘徊。

投闲莫怪时人弃，傲骨原非作吏才。

这首七言绝句，借景咏怀，简洁明快，通过对蒙山别墅清幽环境的描写，抒发了不愿奴颜婢膝事权贵、宁肯弃官为民的思想感情，表现出一种刚直不阿的骨气。诗的第一二句写景：茅舍几间，依山傍水，清流映带，山色送青，水滨沙暖，鸥鹭嬉戏，和谐相处，充满生机。这样清净的自然环境与污浊的封建官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的第三四句抒情：





写致仕的原因，说自己辞官归家，并不怪时人嫌弃，而是因为自己有一种刚直不阿的骨气，原本就不适宜去做官。表现出一种厌弃官场，回归自然的情怀和不向恶势力屈服的高尚气节。

七律《延寿寺避暑》，是王之翰的又一首诗作：

岚烟漠漠树苍苍，小径斜穿到上方。

满目云山凭兴遣，一天风雨助诗狂。

磬声清越浮空翠，花片闲飞入竹房。

六月炎蒸无避处，幸栖精舍有余凉。

延寿寺在蒙山之阴，此地绿树掩映，空气凉爽，环境清幽，是避暑胜地。这首诗就是写作者六月在延寿寺避暑的所见所感。诗的首联，写古寺周围，烟岚朦朦胧胧，林木郁郁苍苍，弯曲偏斜的小径通向寺院。这两句诗营造了一种“深山藏古寺”、“曲径通幽处”的意境。诗的颔联，写作者穿行在山林小径所见之景，所生之情。山色云影，任凭游兴自由驰骋；清风疏雨，更助长了诗情的高昂喷发。诗的颈联，写古寺的幽静：清越的磬声在翠绿的林表荡漾，落花随风轻悠悠地飞进竹房。写“磬声清越”，“花片闲飞”，以动衬静，更显出古寺的清静。这两句景语，颇有王籍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妙趣。诗的尾联，写作者在延寿寺避暑的感受：在酷热蒸人的六月天，幸亏住在这山中幽静的寺院才得以享受无限的凉爽。写在深山古寺避暑所感到的清爽惬意，自然也流露出作者对污浊的封建官场的厌弃之情。寓情于景，景中蕴情，是这首诗的特色。

杨昂，明蒙阴人，庠生。曾于春晨到蒙山仙洞游览，并写有七律《游仙洞》：

仙家古洞锁空山，携酒登临醉里看。

花气一川红雾湿，松风万壑翠涛寒。

敲戛金玉吟怀爽，俯仰乾坤眼界宽。

借问王乔今在否？可能相见授金丹。

仙洞是蒙山的一大景观，在蒙山北麓的蒙阴境内，旧为蒙阴八景之一，又称南山仙洞。洞广可容百余人，据传汉承官曾隐居于此。这首诗准确生动地描写了仙洞周围的自然美景和仙洞优美的神话传说，表达了作者游览仙洞时的愉悦心情和对超尘脱俗仙人的向往。诗的首联，写仙洞隐藏于深山之中，为仙家修炼之地，自己携酒登临山洞尽兴游览。“醉里看”，是说作者被迷人的景色所陶醉。诗的颔联，写春晨山中的美景：花气满川，红雾湿润，松风万壑，翠涛滚滚。这一联写景极工，“花气一川”，言山花之多，花开之盛，花气之香；“红雾湿”，弥漫的晨雾，被花色映红，使人感到空气湿润；“松风万壑”，言松林之大，松色之翠，松涛之壮。“翠涛寒”，浓重的翠色，被山风吹动，使人感到春寒料峭。诗的颈联，写作者游览蒙山仙境陶醉的情态，声调铿锵、抑扬顿挫地畅吟抒怀，感到非常清爽；俯察大地，仰观天宇，顿觉眼界宽阔。诗的尾联，写作者置身仙洞，便情不自禁地想起传说中的仙人王乔来，并设问王乔是否还在，可否见面传授炼金丹之术。全诗把山中美景、神话传说、游览感受巧妙地融合一起，构成了完美的意境，给人以美感。

朱克生，江苏宝应人，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春三月登蒙山，游览了蒙山西路、蒙顶、中路的自然人文景观，写有五言古体诗《登蒙山绝顶》：

振衣临绝巘，倚石立霞表。旁瞩群峰低，俯眷平畴窈。

眉际生烟岚，足底巢猿鸟。历历青齐路，杳杳徐兖道。

远与岱宗连，近望徂徕梢。巉岩拱帝阙，丹碧胜蓬岛。

上方闻磬铎，下界割昏晓。霁色胜沧溟，水光接浩淼。

峻壑钟薜萝，斜窦茂繁筱。履高风自雄，近夕日微渺。

地远禽声绝，岁古碑文少。坚冰曲涧凝，积雪阴崖皎。





春尽无浓桃，夏初见萌草。峭壁直千寻，环崿自重绕。  
身世等浮云，神仙隔缥缈。危萝怯攀缘，险峰惧倾倒。  
居民画山川，方土辨了了。回首怅风尘，几人纵登眺。  
唯传孔仲尼，一视东鲁小。

这首诗主要写了作者置身蒙山绝顶的所见所感。诗的内容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从“振衣临绝巘”至“水光接浩淼”为第一部分，主要写蒙山绝顶的高峻奇险，及立身绝顶，翘首八荒，放眼所见之奇观。俯仰乾坤，诗的境界宽阔，气势恢宏。从“峻壑钟薜萝”至“环崿自重绕”，为诗的第二部分，主要写蒙顶的生态、气候、古迹、景观、奇险。这几句诗对仗工整，韵律和谐，状物准确生动，特点鲜明，非身临其境、细心观察而又有深厚的诗词功底者，是很难写出来的。从“身世等浮云”至“一视东鲁小”，为诗的第三部分，主要写作者登临蒙山绝顶的感悟。感到蒙顶这样超尘脱俗、神奇绝妙的仙境，登临者并不多，只流传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的佳话。作者的览物之情，自然也流露出对先贤孔子的思念。

朱克生春日游览蒙山，不仅留有诗篇，而且还写有散文《蒙山记》。在《蒙山记》中对蒙山西路、蒙顶、中路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作了准确详细的记述，历历在目，宛如如画。《蒙山记》中写道：

“余谒蒙祠毕，策蹇而北至回马岭，易筇舆，过石盆，度黑风口，折十八盘，皆乱石参差，层峦屈曲。上陡山，历小风门，望舍身岩，削壁千寻，俯临万丈，峭崿剑立，峻巘森罗。路仅容肩舆，过此，肤寒粟起，股战。复历大风门，步快活岭，至南天门，憩于庙左，喘息稍定。盖自回马岭，至此十八里矣。庙后道上，乔松茂柏，参霄蔽日，攒岸被壑，枝交干连，翠色清芬，映人衣带。行五里，由二仙桥升朝天宫，入慈宁宫，拜玉帝殿。旁有‘孔子小鲁’碑，以蒙名东山也。东北陟二里许，登山绝顶。其山峰岩，皆北拱。西望徂徕山，东对天马岭，南指抱犊崮。其后养真洞、封真洞，金仙岭，土人采蒙茶者，始得绳而下，茶产石窠，形如石薜。下顾平畴，杳然白气，不辨邱陵，脚下皆云生处也。是日晡，遂宿慈宁宫之右室。诘旦，由官左陟望海楼，楼不存，基尚在。旁之苍松



虬干，从石隙横出，侧立倒垂，龙蟠虎踞，谡谡如奏笙簧。已转东南至擂鼓台，渡柳子沟，谒白云岩，羊肠鸟道，百曲千回。平视群峰，罗列左右，俯瞰众壑，窈窕横斜，徘徊不忍去。因援笔为记。”

把朱克生在诗中所写的情景与文中所记的内容相互参照，更能感到蒙山的博大精深、景观奇妙。这样的诗文，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公谷，蒙阴人，生员，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参加纂修《蒙阴县志》。曾游览蒙山，赋《登蒙山》诗：

杖抵中峰日已西，攀缘疑与碧天齐。

抱崖苔积石尖没，压岫云来松径迷。

花放锦茵排远近，泉飞白练挂高低。

千岩万壑真如绘，不羡长康叹会稽。

这首七律主要写蒙山景色之美和作者登山游赏之乐。诗的首联，写拄杖抵达蒙山中峰时太阳已经偏西，继续攀登，仿佛感到身与天齐，极言山峰耸峙之高。诗的颔联，写山崖的苍苔植被遮蔽了突兀的峰尖，出岫的烟云迷漫了松林的小径，言山色变化之奇。诗的颈联，写山花烂漫，好像锦茵布列远近，飞泉叠瀑，好像白练悬挂高低。二句所状之景，有声有色，历历在目。诗的尾联，写千岩万壑美如画境，置身其间，就不用再羡慕诗人谢康乐赞叹会稽山水之美了。言外之意，蒙山之美，堪与会稽山水相媲美。

王本敬，道人。隐居蒙山，览胜咏怀，有诗传世。《蒙山杂咏》这组诗共五首，风格淡雅清新，颇有唐王维山水诗的韵致。

#### 《桃源》

鸟路入云斜，夭桃几树花。

今朝寻胜地，昔日列仙家。

鲜花萦岩穴，流泉走涧沙。

渔舟应误入，源里认桑麻。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描写了一个人类理想的社会——桃花源。桃花源里环境优美，安定和谐，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勤劳，平等自由，生活富裕，风俗淳厚。这样的理想境界，自然为人们所向往。后人常把美好的境界誉之为“桃源胜境”，在诗词中亦多有吟咏桃源者。王本敬的这首诗通过写蒙山中的胜境桃源，寄托了对桃源理想社会的向往。诗的首联，写桃源隐藏在蒙山深处，有鸟道相通，云霞弥漫，桃树茂盛，鲜花竞放。诗的颔联，写诗人今朝寻访的桃源胜境，正是昔日仙人居住的地方。诗的颈联，写桃源中烂漫的山花盘绕覆盖着山崖洞穴，澄澈的泉水欢畅地流过涧底沙滩。写景动静结合，有声有色。诗的尾联，写应当到桃花源中来过那种“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抽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生活，流露出作者对桃源社会的向往之情。

#### 《对松山》

高下苍松古，涛声暮欲秋。

林深青嶂合，树密白云留。

老干堪栖凤，枯枝欲化虬。

登高望峻险，扶葛下龙沟。

对松山，是蒙山的一大景观，满山苍松密布，隔山溪与白云岩道观相对，故名。这首诗重点围绕写“古松”优美的风格谋篇布局，对松树的赞美之情，洋溢诗中。诗的首联，写满山苍松之古，松涛声势之壮，突出对松山的特点气势。诗的颔联，写密林青嶂，白云缭绕，“青嶂合”、“白云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蕴含生机，是登对松山所见之景。诗的颈联，特写松树的枝干，老干可栖凤凰，枯枝欲化虬龙，进而写出古松之美。诗的尾联，写登高远眺望崇山之险峻，扶葛牵藤下临山涧之清流，都感到愉悦。



### 《下院》

玉液泉边水，朝阳洞里花。  
引流浇旧圃，过雨采新茶。  
草药因春长，萝藤入径斜。  
崖前生意动，日午闹蜂衙。

这首诗写的是白云岩清虚观周围的清幽环境和道人的恬静生活。诗的首联，写玉液泉水清澈，仙洞山花绚丽，环境极为优美。诗的颔联，写引来清流浇灌旧的园圃，春雨过后采摘新的茶叶。诗的颈联，写种植的草药凭借着春天茏茏生长，蔓延的萝藤遮掩着弯弯的山径。诗的尾联，写白云崖前也是生机勃勃，中午成群的蜜蜂正旋绕着蜂王忙碌地酿蜜。全诗选取了白云岩道观春天最富有特色的景物，加以生动地描写，构成了一种春意盎然的境界，生活在画境中的道人，咏诵经文之余，还从事浇园、采茶、种药、养蜂等活动，其融于自然，远离世尘的清雅生活，自然也令人神往。

### 《琴台》

爽气满秋空，琴台地半弓。  
临风挥玉麈，过雨理焦桐。  
宝鼎茶烟绿，深林落照红。  
再弹弦外意，天际有飞鸿。

琴台，在白云岩清虚观外，为一方形石台，为道人弹琴所用，台旁古树浓荫，遮天蔽日。这首诗写秋雨过后，天晴气爽，道人在琴台挥麈理琴，品茶赏景，谈笑风生的欢快情景。表现了道人们高远的精神境界。诗的首联，写秋山雨后，空清气爽，琴台净洁，正是闲坐抚琴的好时光。诗的颔联，写道人面对习习晚风，有的挥摇玉麈，有的抚弄琴弦。诗的颈联，写宝鼎里飘散着煮茶的绿烟，深林里闪耀着夕照的红光。白云岩的上方是鹰窝峰，“鹰峰夕照”是蒙山的一大奇观。诗的尾联，写琴声中寄托着弦外之意，天际的鸿雁也许能把这弦外意带到远方。诗中流露出道人们志存高远的精神境界。

### 《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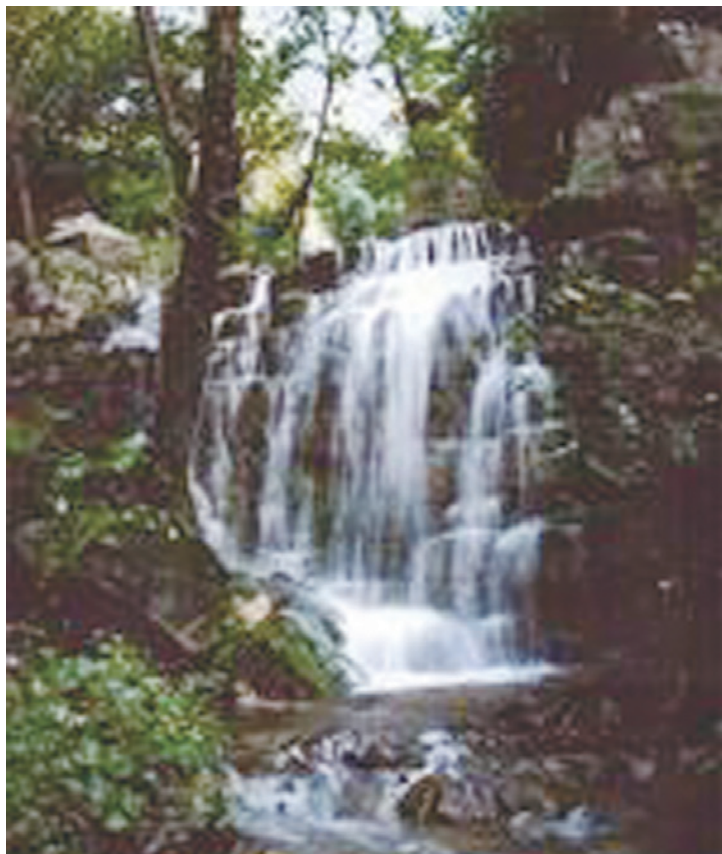
每到天将雨，烟云万壑生。  
山光时断续，树色不分明。  
乍似堆绵重，还如炊黍轻。  
无心休出岫，惬我坐看情。

这首诗特写夏季蒙山白云岩出云的奇观，及作者坐看云起的闲情逸致。写景细致入微，生动逼真。诗的首联，写每逢天将下雨之时，总先有烟云从千山万壑中升腾弥漫。诗的颔联，写浮动的烟云使山光时明时暗，也使树色变得朦朦胧胧。诗的颈联，写出云的瞬间变化，暂时好象堆起棉絮那样厚重，忽而又像袅袅的炊烟那样轻飘。诗的尾联，写诗人坐看夏云出岫升腾，深感惬意。这两句分别化用了陶渊明的名句“云无心以出岫”、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巧妙地化用前人的语句，用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志，同样也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刘宝鼎，平原人，清道光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拔贡，有“平原宿儒”之誉。光绪十六年（1890年）任费县教谕。参与编修《费县志》，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为重修《费县志》作序。曾游览蒙山，有《白云岩记游》八首，详记白云岩之景胜。此选二首，予以鉴赏。

#### 其一

此日登临愿不违，杖藜随意揽山辉。  
遥看崖树攒青霭，逆溯泉流上翠微。  
绝壁几重当路起，断云无数傍人飞。



行行指顾前途笑，早有客敲岩下扉。

这首诗主要写作者拄杖登山沿途所见之美景和行将到达白云岩道观时的欢快心情。诗的首联，写此日登临蒙山遂了个人的心愿，拄杖任意观赏山中风光，有目不暇接之感。诗的颔联，写举目远望山崖上的树木聚集在青色的烟霭中，逆着涓涓泉水向高处攀登葱翠的山峰，步换景移，进入佳境。诗的颈联，写重重叠叠的悬崖峭壁拦路耸立，时断时续的云烟悠然地贴近游人飞动。中间这两联，写景逼真生动，宛然如画。诗的尾联，写同游者一路谈笑风生，临近白云岩道观时就听到了有人敲门的声音，其高兴心情，自可想见。

其二

此是三清碧玉坛，搗来高处一凭阑。

纵横俱见山河小，俯仰能教天地宽。

榻宿白云晴带湿，筵排绿竹夏生寒。

愿将薪水供坡老，相与看烧九转丹。

这首诗写作者在白云岩道观登高览胜所见之景、所生之情。诗的首联，写白云岩道观为神仙居住之处，有幸来这里登高览胜，别是一番境界。诗的颔联，写凭阑所见所感，不论是纵看还是横看，都感到山河的渺小，只有仰观俯察才觉得天地的宽阔。诗的颈联，写下榻休息，虽是晴天，缭绕的白云也带有几分湿润，席地而坐，尽管是夏日，茂密的竹林还是生出一些凉意。这样林木茂密、空气凉爽、山青水秀的清静环境，自然是夏日避暑的胜地。诗的尾联，写自己愿意为坡老打柴汲水，与他一起在白云岩炼丹修道。“坡老”，指北宋诗人苏轼。苏轼曾游蒙山。在他的诗《送乔仝寄贺君六首》中写道：“旧闻父老晋郎官，已作飞腾变化看。闻到东蒙有居处，愿供薪水看烧丹。”苏轼有归隐蒙山之念，作者“原将薪水供坡老”，自然也有超尘脱俗之想。



# 临沂阻击战

高雷整理



日军进攻临沂



国民革命军顽强抵抗



战斗中的机枪手

临沂阻击战是台儿庄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2月，日军妄图南北对进，打通津浦线，控制陇海线，围歼国民革命军主力于徐州地区，进逼武汉，迫使中国最高当局签订城下之盟，迅速结束侵华战争，以此发动了徐州会战。

在南部日军被迟滞于淮河一线之时，北部日军第10师团，第5师团，分别从济宁、潍县向徐州进击，形成了钳形攻势。

2月21日，日军第5师团片野支队到达莒县招贤镇，临沂阻击战就此拉开了帷幕。在以后的50余天里，从莒县到兰陵，在长达100多公里的战线上，国民革命军先后投入了第40军，第59军，第57军111师333旅，第13军骑兵团，第85军与第52军各一部，骑兵第3军第9师，第25军第13师，第9军第21师等部队。用人墙阻挡了左路日军第5师团坂本支队地逐次进攻，歼灭日军8000余人，为第5战区争取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达成了对突出、孤立之右路日军第10师团的战役合围，重创了第10师团濑谷支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欢呼胜利



援军渡过沂河



沂蒙民众支援抗战



反击中的国民革命军

# 解放军70个军的番号由来 (下)

叶青松

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电报精神和《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重新整理了新的改编方案，上报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7日，中央军委电复东北野战军：“同意按照全军统一规定，更改番号。东北野战军第一至第十二纵队，依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至四十九军；第一师至第三十六师，依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一二师至第一四七师。每个军另辖一个独立师……”

东北野战军经中央军委批准，以东北军分委主席林彪和副主席罗荣桓的名义，下达了东北野战军纵队改称军并授予番号的命令。命令中说：“（一）为适应战略任务，更进一步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东北野战军所辖十二个纵队，统一改称为军，并批准每军下辖四个师。军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军’，师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师’，团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团’，自三十八军起至四十九军，编入各军之各独立师自一百五十一师起。兹将原番号及改称之新番号列表公布如下：（略）。（二）原纵队的首长，改称为军长、政治委员，以下均同。（三）各纵应以师为单位，召开隆重的大会，正式宣布新番号及其意义。”

自东北野战军所属部队使用军番号后，其他野战军所属部队也经中央军委批准陆续开始使用军番号。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华北军区依次将一兵团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第十五纵队、第三纵队、第四纵队，二兵团第八纵队、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第十四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至七十军。1949年1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所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纵队，依次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所辖第二、第三、第六纵队改称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纵队改称第十三、第十四军，第九纵队改称第十五军，第一纵队及豫皖部队一部、第十一纵队及冀鲁豫部队、二十旅及豫皖苏部队一部，依次改称为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所辖第一至第十三纵队（没有第五纵队番号），依次改称第二十至第三十一军。1949年3月7日，东北野战军发出通报：“顷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五日命令：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我东北野战军自三月十一日起开始使用新番号。今后东总改称四野总（本军范围内称野总，本军范围外称四野总），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称四野司（野司），政治部简称四野政

（野政），后勤部简称四野后（野后）。”至此，全军统一番号基本结束。

## 番号使用中的四件轶事

在整个军番号使用审批过程中，有四件轶事。

轶事之一：二野要求增加番号。1949年2月17日，第二野战军向中央军委提出增加军番号。刘伯承和邓小平致中央军委电称：“军委：（甲）丑删（1949年2月5日）电奉悉，我们遵即将各兵团所属军师番号，重新排定如次：……（乙）决定夏季后将陕南部队编为第十九军。（丙）拟将原桐柏之第十纵队、江汉之十二纵队各编一个军，皖西部队编一个师，唯规定给中野之番号已满额，请予以规定。刘、邓。筱西。”中央军委接刘邓“筱西”电后，电令原桐柏之第十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军；江汉之第十二纵队等部队合编为湖北军区。

轶事之二：三野变更番号使用。1949年1月29日，华野前委给华东局和总前委电文中，可以看出对吴化文、何基沣、张克侠等起义部队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番号的变更情况。电文中是这样说的：“为了使吴化文、何基沣、张克侠各部起义军队得到迅速改造，并以便解决干部问题，经我们讨论以鲁中南纵队与吴化文部合编为三十五军，以渤海纵队与张克侠部合编为三十三军，以江淮两个旅与何基沣部合编为三十四军。当陈毅同志从华东局回来前，本拟以十二纵与何基沣部合编，但因十二纵已组成三个师，且将来主力南渡，尚须留两个军于江北，故仍以将江淮之两个旅也上升与何基沣部合编为宜。至于江淮两个旅上升后，对江淮地方工作及地武建设有如下意见……”华东局和总前委采纳了华野前委意见，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由此，原本将华野第十二纵队与何基沣部合编为一个军的番号，变更成了华野第十二纵队单独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

轶事之三：东北野战军先使用军番号，4个月后才启用“第四野战军”的番号。这与中央军委在规定全军统一使用番号时下达两个决定有关。第一个决定就是前面大家看到的1948年11月1日下达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该规定非常明确地说，全军整编为4个野战军，5个大军区，20个兵团，70个军，其中对4个野战军的番号规定是这样说的：“野战军现时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因此，东北野战军最早使用军番号时，中央军委并没有对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的番号作出明确规定。其实，此时中央军委的思路，野战军番号还是停留在冠以“地名”的思路。但是，当东北野战军入关，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现野战军使用地名的野战军番号已不适用，于是，中央军委在1949年1月15日，专门下达电文对4个野战军的番号作了重新规定，不再以“地名区分”，代之的是用“第一野战军至第四野战军”加以区分。原电文比较短，现原文摘录如下：

### 各军区、各野战军：

估计今年战争的发展，去年戌东电规定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兹决定改为按番号顺序排列如下：

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

请各区各军即照此电在整训期间公布施行。

### 军委子删

中央军委下达此令时，东北野战军的“军”番号已启用，而西北、中原和华东野战军由于处在战争状态下仍未启用“军”番号，所以出现了西北、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在全军统一番号时，同步使用了军的番号和第一野战军至第三野战军的番号，而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时，军的番号早已启用。



轶事之四：华北军区宣布新番号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军区的第一、二、六纵队改为第六十六军至第六十八军的番号时间是在1949年1月29日。此时正值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于是，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发布改称命令说：“对于新番号之公布，各军、师可于庆祝北平解放祝捷大会上隆重地宣布，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顽强地作战，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保证我们光荣的胜利的番号传播到全中国去，这是我全军的尊严的义务。”

### 首任军长是67位还是66位

至此，读者朋友应该已非常清楚70个军的由来和只使用了67个军番号的脉络了。笔者写了66位首任军长，而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只有65位首任军长。那么，首任军长到底是多少位呢？

按常理，67个军应该有67位首任军长。但是，在这67个军里面，有一个军的成军时间非常短，短到连军长都未配上，就被撤销了。这个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十军。1949年1月，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改称为人民解放军第七十军，甘渭汉任军政委，石志本任副军长，高厚良任军参谋长。1949年9月，第七十军番号撤销时，军长尚未配上，部队缩编为第二〇七师。中央军委为什么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撤销这个军呢？原因是聂荣臻、薄一波和唐延杰有一个建议。该建议原文为：“报军委：七十军为紧缩机构便于整训，提议将该军缩编为一个师，我们同意（现该军辖两个师共11916人，每连不满百人）。拟将军直改为师的直属架子，所属两个师直的勤杂人员可充实连内，而干部除另外分配外可入军大学习。以上编组调整是否有当，请示。聂、薄、唐申齐（1949年9月8日）”。为此，第七十军的首任军长就成了空缺。

其实，还有一个军比第七十军的番号撤销更早，而且军长、政委都未配上。这个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1949年1月，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时，只任命了周彪为副军长、漆远渥为副政委，没有任命军长和政委。5月，第六十九军的番号被撤销。这就是许多读者朋友和研究人员误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65位首任军长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是有首任军长的。读者朋友会问了，部队番号都撤销了，而且未任命过军长、政委，哪来的首任军长呢？我们把时间放到1953年，事情就清楚了。1951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二十三兵团从朝鲜胜利回国，驻河北定县。1952年12月15日，第二十三兵团改编为第六十九军。1953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董其武为第六十九军正兵团级军长，裴周玉任军政委。由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首任军长便产生了，他就是董其武。

### 全军统一番号后的关防印章之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番号统一后，中央军委对各级的关防印章使用作了明确规定。

对于印文，中央军委作了三点规定：一、关防至团级为止，其印文必须以军委戌东（1948年11月1日）电令所规定的全军统一的名称与番号刊行之。野战军在军名之后加其番号（或地区）名称，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关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兵团关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军关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或骑兵）第某师关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或骑兵）第某团关防。军区则在军名之后加军区名称，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关防，中国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军区关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太行军区关防，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三边军分区关防。隶属军区之部队，则在军名、军区名之后，再加部队番号，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警备第某旅关防。二、印章的使用，团以上各级政治机关（政治部或政治处）



钐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防的证件

一律用方印，印文除在文尾加政治部印或政治处印等字样外，其他与关防同，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军政治部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某师政治部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某团政治部（处）印。团以上各级司令部及其所属各工作机关，如参谋处、供给处等，一律用方形公章，印文除在文尾加机关名称外，亦与关防同，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兵团司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军参谋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某师供给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某团司令部。三、条戳至连级为止，使用与印文、关防相同，团级以上者在印文文尾加“司令部”或其他工作机关字样，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军参谋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骑兵）第某师供给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某团政治处；营、连则加“营部”、“连部”等字样，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某团第某营营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某团第某营第某连连部。

具体的尺度规定为：一、关防，纵长（上下）野战军为95毫米，以下逐级减小5毫米；横长（左右）野战军66毫米，以下逐级减小4毫米；边宽野战军及兵团为11毫米，军、师为10毫米，团为9毫米。二、印章，方印悉照同级关防之横长作正方形，边宽亦与同级关防同。公章尺寸大小，比同级政治机关方印小2毫米，边宽小1毫米。三、条戳无边，纵长野战军一级115毫米，以下逐级减小5毫米；横长野战军一级25毫米，以下逐级减小1毫米。

关防印章的字体，一律用老宋字。中央军委在规定中解释说，“因老宋字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易认。同时太平天国之印信亦为老宋体，有中国人革命传统的意义”。同时，中央军委规定关防印章的外四角，均略作圆形，“以象征全军团结之意”。此外，中央军委还对关防印章和条戳的使用范围作了明确规定。

# 姓氏百家漫谈——陈姓 (下)

赵丹峰



陈 毅

在1955年评授的共和国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中，有两位在人民革命战争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陈姓元戎，分别名冠其间，这就是陈毅和陈赓。

陈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驱逐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后，他率武汉中央军政学校的干部、学员赶赴南昌，因途中受阻，在临川加入起义部队后随军南下。1928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后与朱德一起率部转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开辟者与领导人之一。1929年1月，他与毛泽东、朱德一起率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开辟了赣西南和闽西苏区，为后来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其间，曾协助毛泽东召开古田会议，确立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转战闽、粤、赣，坚持了为期三年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八方奔波，参与将分散于南方诸省的游击队组编为新四军的工作。后历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指挥，指挥了著名的黄桥战役，开辟了苏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与刘少奇一起临危受命，重建新四军军部，任代军长，领导华中敌后的抗日战争。1945年9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华中局北移山东，和山东分局合并，组成中共华东中央局。9月底，陈毅率新四军领导机关到达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与罗荣桓会面交流情况后，罗荣桓即率6万名山东八路军主力急进东北。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临沂成为内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从1945年9月至1947年秋，陈毅在以临沂为中心的大鲁南地区度过了非同寻常的两年时光。此期，相继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先后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特别是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以集中优势兵力，于“百万军中



取上将首级”的气魄，运用山地运动歼灭战和快速战的作战形式，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主力七十四师3.2万余人，彻底挫败了国民党对以临沂为中心的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而使华东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47年秋，陈毅率华野主力一部离开沂蒙地区，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密切协同，驰骋于中原战场，使解放战争从此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他又相继参与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市长，带领广大军民，注意团结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克服困难，齐心协力，为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这座最大的金融工商业城市的经济运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调中央工作后，他于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此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重要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人民外交工作和国防建设事业，殚精竭虑，作出了有口皆碑的重要建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遭到严重迫害。

陈毅博学多才，素以文武兼备著称。在临沂战斗工作期间，陈毅便于纵横疆场、运筹帷幄之间隙，创作了一批堪称为“史诗”的诗词作品，这些作品既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作于临沂城的《哭叶军长希夷同志》和《悼罗炳辉将军》等诗，寄托了作者对已逝战友的无限哀思；吟于峥嵘沂蒙群山之中的《如梦令·临沂蒙阴道中》词，则由衷赞美了沂蒙群峦耸峙的壮美景观：“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在这些诗作中，最能震撼人心的，应是作者作为华野解放军统帅，运用诗词这一独特的表现形式，对人民战争恢宏场面的描绘，以及对不同战役各自特点的阐释。如作者在《鲁南大捷》中写道：“快速部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看似直白的短短28个字，就将陈毅利用天雨雪，苍山县贾头、吴家桥、柞字沟之间的黑土湖（凹地）里泥粘如胶的天时地利，使国民党快速纵队的坦克、辎重陷滞其中，其现代化优势不能发挥、反成累赘的窘相，刻画得活龙活现，入木三分，再加上看过在此战役结束后，陈毅与华野其他战友站在缴获的敌军坦克上的会影照片后，更使人体味到这位杰出军事家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精深。4个月后，陈毅在《孟良崮战役》一诗中这样描述了此场恶战的酷烈程度：“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流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

湿战袍。”读着上述滚烫的铁血诗句，使人有如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决定国共两党胜负全局的淮海大决战中，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的陈毅深知战争的成败在于民心向背，他多次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在《记淮海前线见闻》一诗中，作者饱含深情地记述了沂蒙及山东老区人民车轮滚滚支援前线的感人场景：“几十万，民工走不通。骏马高车运粮食，随军转战逐西东，前线争立功。”陈老总的上述诗章连同他在临沂期间的诸多故事，至今仍为沂蒙人民广为传颂。

陈赓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黄埔军校创办后，他作为第一期学员入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其颇富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生涯。毕业后留校工作，相继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因作风果敢，一时驰名黄埔学生军。在东征中，他曾冒着枪林弹雨，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战中负伤的蒋介石背离险境。据说撤至台湾后，晚年的蒋介石仍感念此事，并叹息当年这位自己的学生及救命恩人，日后未能为其效力，终至成为大量歼灭自己生军力的强劲对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从苏联学习回国的陈赓随即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翌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此时的陈赓，如同一把神剑利器，保卫着中共中央的安全，并为中央决策层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重要情报，成为中共早期情报工作和保卫战线的先驱者之一。1931年赴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第四方面军师长。翌年因负重伤秘密到上海就医，1933年被捕。被捕后，英勇坚贞，严词拒绝了蒋介石的诱降，保持了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后经中央和宋庆龄等营救脱险。遂至中央苏区，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校长。长征中，任军委干部团团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和太岳纵队司令员，参与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陈赓率部参加上党战役，给主动挑起内战的国民党阎锡山部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1946年7月后，他率部转战晋南，六战六捷，声威大震。1947年8月，他与谢富治一起率陈谢大军强渡黄河，进军豫西，开辟了豫陕鄂解放区，与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和陈（毅）粟（裕）大军紧密配合，形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以鼎足之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拉开了中原地区战略进攻的帷幕，上演了摧枯拉朽、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活剧。1949年，他作为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先是率部入

粤扫除残敌，随后又挥师云南，指挥了滇南战役，之后作为云南军政主要负责人镇守云南边陲。1950年7月，应邀赴越南帮助进行抗法战争，协助指挥越南军民取得边界战役的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代政委。1952年凯旋后，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为培养造就一大批新中国国防建设急需的军事工程人才，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54年后历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1年3月不幸病逝，年仅58岁。

在以沂蒙（广义上的沂蒙地区含鲁中、鲁南、滨海三大根据地）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壮大中，有两位陈姓领导人功不可没，这就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陈明。陈光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担任红军第四军师长，后任少共国际师师长。长征后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战爆发后，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林彪负伤后，即任一一五师代师长。1939年，他与一一五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起率部由山西挺进鲁西，之后挥师鲁南抱犊崮山区，从此开始了领导山东军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和创建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从1939年初至1943年春，陈光共在沂蒙地区工作战斗了4年的时间。其间，他与政委罗荣桓紧密配合，各司其责，指挥了一系列知名的战斗和战役，如三次甲子山反顽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滨海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为日后开辟滨北地区、打通滨海与胶东地区的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1943年1月的郯城战役，粉碎了日军“蚕食”滨海根据地的计划，首创八路军在山东敌后运用“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成功攻占城池的范例。陈明系参加长征的老革命。1938年10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长。1939年3月，随罗荣桓、陈光到山东。7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府工作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秋，他亲自指导沂水县六区的民主建政工作，并以《拥护民主政权》为题，为《大众日报》撰写社论，被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誉为“山东的一位有权威的理论家”。1940年7月，山东省联合大会在沂南青驼寺召开后，陈明担任刚刚创立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前身）副主任兼秘书长，协助主任黎玉领导全省的民主政权建设和抗战动员工作，是当时山东抗日民主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日常工作主持者。1941年11月，日军调集5万重兵对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拉网式大“扫荡”。陈明率抗大一分校部分学员和少量部队在大青山下与敌一个旅团的兵力遭遇，不幸壮烈牺牲。

在文化科技领域，有一大批陈姓人士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努力，为国家科技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名人主要有：陈邦贤是著名中国医史学家，他倾毕生精力开拓中国医史研究，他撰著的《中国医学史》于1919年出版后，即在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后经多次修订一版再版。此书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医学通史。陈达是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便致力于节育问题的研究与宣传，他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在人口、劳工问题方面注重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子女。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劳工问题》（1929年）和《现代中国人口问题》（英文版，1946年）等。陈三立系光绪进士，江西义宁人，曾参加戊戌变法，是清末和辛亥革命后同光体诗派的代表性诗人。陈三立生有五子，受家庭文化熏陶，日后均成为中国现代卓有成就的文化大师。在义宁陈氏五杰中，陈衡恪长于诗书



陈 庚



画，陈隆恪擅诗文，陈寅恪是历史学家，陈方恪是一代才子，陈登恪是外国文学家。其中以陈衡恪和陈寅恪成就最大，享誉中外。陈衡恪是民初著名画家，他擅长写意花果，喜作园林小景，此类画作钩多皴少，生辣强劲，宛若白描，极富诗意。近代绘画史学家俞剑华称其兰竹作品“为近代画坛一绝”。能写生，用色大红大紫，充分发挥鲜艳色彩的长处。偶作人物画，画风清新爽健。鲁迅赞其“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他与齐白石交谊甚笃，当年齐白石在北京卖画为生，艰难度日。陈逛琉璃厂时偶见齐白石所刻印章，激赏不已，遂到其所住法源寺造访，齐取出《借山图》请他观看，他便欣然赋诗一首，劝其不必求媚于世俗，齐白石感悟其指点，遂行“衰年变法”，终成一代宗师。1922年，陈衡恪赴日本参加画展，随身亦带去齐白石的画作，受到高度评价。法国人在东京选了部分陈衡恪与齐白石的作品，去巴黎参加艺术展览会，陈、齐二人一时名动海外。不久，齐白石写下“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诗句，感述自己与陈衡恪的深厚情谊。陈寅恪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先后赴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各名校深造长达十余年。1925年起，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和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其学识广博宏富，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深的研究，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大师，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曾为陈寅恪学生和学术助手的我国著名史学家周一良于1935年在清华听完陈寅恪的课并阅读过其学术论著之后，遂深深感到：别的先生的学问，经过努力，似乎有望达到，而陈寅恪的学问是自己终身无法企及的。陈寅恪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专著及重要学术论文数十篇。陈白尘和陈伯吹系著名作家。陈白尘在建国后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其主要成就为剧本创作。从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共创作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50余部。《结婚进行曲》、《升官图》、《乌鸦与麻雀》、《金田村》、《大渡河》和《大风歌》等系其代表作。其喜剧作品风格泼辣犀利，悲喜交集，曾发挥过很大的战斗作用。陈伯吹一生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发表小说、散文、童话、诗集计数十种，在国内小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陈寅恪

陈建功、陈省身、陈景润系著名数学家。陈建功在1926年第三次赴日留学期间，发表数学论文十余篇，引起日本与国际数学界的重视。他于1930年发表的《三角级数论》至今仍被引用。陈建功在数学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函数论，尤其是直交函级数论、三角级数论、单叶函数论和函数逼近论等方面的研究上。陈省身是现代微分几何奠基人之一，数学最高荣誉“沃尔夫奖”获得者。1937年从国外学习回国后，任教于西南联大。后到美国从事研学工作。1946年复又回国在上海创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培养了一批青年拓扑学家。1949年后再去美国从事数学教学与研究，上世纪60年代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数学会副主席、伯克利教学所首任所长。他首创应用纤维丛概念于微分几何，引进了（被叫做）陈示性类，为大范围微分几何提供了工具，亦为复流形微分几何与拓扑研究开辟了道路。所引进的概念、方法与工具，已远远超出了微分几何与拓扑的范围，成为整个现代数学的重要构成部分。1975年通过规范场与理论物理联系起来。1984退休后重回中国，在其母校天津南开大学定居，创办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在谈到中国人何为在大陆工作至今尚未有人拿到沃尔夫奖、菲尔兹奖和诺贝尔奖时，



陈省身认为：一个人一旦学术上有所成就后，在国内给他们所安排的官场上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专心做学问。要做学问就要安静，甚至电话都不要接，不能打断思路。此话极为精辟入里，很值得执政者深思。陈省身的学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赞陈氏级》诗中有“千古寸草心，欧高黎嘉陈”之句在学术界广为流传，他将陈省身列为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之后的世界第五位几何学大师。陈景润是中国著名数学家。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的研究。1966年5月发表《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成为歌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其中的陈氏定理，被誉为筛法的光辉顶点。

陈永康系农民出身的中国著名农学家。他首创水稻“一穗传”选育方法，1951年即创出单季晚梗亩产716.5公斤的高产记录，1958年提出水稻叶色“三黑三黄”看苗诊断技术，建立起综合性水稻栽培技术体系，在水稻大面积高产稳产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所著《陈永康水稻高产栽培技术》流传甚广。

在文艺界，陈姓亦多出名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强，早年以饰演反派人物著称，晚年在与其子陈佩斯联袂打造的系列喜剧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老爷子”幽默艺术形象，深受广大观众喜爱。陈小奇是改革开放后广东流行音乐的开拓者，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音乐的著名歌词作家和作曲家，他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其中如《涛声依旧》、《我不想说》、《梦江南》、《烟花三月》和《九九女儿红》等歌曲，已成为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之作。

在金融实业界，陈光甫和陈嘉庚名闻国内外。1915年，陈光甫与庄得之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这家开办时资本不足10万元，被称为“小小银行”的金融机构，在陈光甫精心经营下，逐渐发展壮大，直至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陈嘉庚系中国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与实业家、教育家。他十几岁时随父到新加坡经商，主营橡胶业，兼营航运和房地产等业。参加同盟会后，鼎力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他热心教育事业，1913年后先后在其家乡厦门集美创办中小学、师范和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并在新加坡亦创办了一批中小学校，同时资助福建省内的70余所中、小学校，捐献办学资金达1000余万元。抗战爆发后，他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组织推动海外华侨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解放战争中，他领导华侨支持国内和平民主运动。1950年回国定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侨联主席等职。



陈嘉庚

# 佩锁链的手术刀

——王国新印象

惠东波



假如我是导演，假如要挑选一名塑造成功教授的角色演员，眼前这位，便非他莫属了——第一次见到王国新，我竟不着边际地产生了这样一个清晰的想法，连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

他确是温文尔雅的“型男”，全身上下端庄、精致且并无雕饰痕迹，尤其白净面孔中的眼睛睿智、明亮，充满着亲和力和机敏、顽强。谈吐条理清晰，准确到位，加上恰到好处的形体和表情语言，散发出似乎是书卷气但又明显带有更高升华的气息。

谈话中，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拿出笔记本打开扉页，让我看了一句话：

当我们成为医生那一刻，我们的身上已经挂上一条看不见的锁链，让我们背负一生。

——法国胸外科之父雷涅克

我似乎隐隐约约地悟出那种气息的源头，莫不就是那条“看不见的锁链”？

## 为了锋利的磨砺

王国新出生在医学世家，其父分别出任过本市一家大型医院和一所医学专科学校的业务负责人。长期的耳濡目染，他从小知道的最多的便是古今中外名医的故事，华佗的神奇，扁鹊的妙招，李时珍的甘苦，林巧雅的敬业……，无不在他的心灵中留下烙印。父亲救治病人

后一脸疲惫却难以掩饰的欣慰表情，关于医生救死扶伤神圣崇高的简短叙说，都成为他这个少年读书郎课堂之外的精神加餐。1977年他顺理成章地踏入了大学，进入了医学专业的殿堂。

在基本掌握基础医学知识以后，王国新确定了外科专业。每有闲暇，他经常对手术器械有片刻的审视，这些排列整齐、晶莹闪亮的器械，犹如在手术刀带领下的一队精灵，急待冲上前线，割除毒瘤，保卫生命；又如一排琴弦，随时准备拨响悠远的命运琴声。他深知，这是注定与自己终生为伍的伙伴，它们的成功与否，全在于他所能掌握的技能。在校期间，他先后在东调医院、市人民医院实习和进修，下班后，别人换上休闲装去游玩会友，唯有他喜欢泡在解剖室，点点滴滴了解掌握人体各部位精密的构造和相互的联接，熟记于心。借助医学世家的便利，他在家备了一整套器械，下班回家后，总要拿出两个小时，在买来的猪内脏上练缝合、练打结，练分离，直到工作后若干年，仍不改这个习惯。

勤学苦练的汗水终将换来丰厚的回报。他毕业后被市人民医院录用，很快成了当时外一、二、三各科都可以上得去的“通才”。1986年，大外科中细分为胸心外科，为外科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科室，他成了其中的骨干。

1989年，王国新被派往齐鲁医院进修，经过短暂的临床实践，他在当时一同进修的100多名学员中便有了小小名气。他作为一个从医不久的年轻人，对手术的理解和熟练程度，让每一个导师和专家都感到惊讶。一天，该院心内科为一位患者做心内导管下球囊二尖瓣狭窄扩张术，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要求心外科急救。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心外科李守先主任首先想到了进修的王国新，立即安排随他上台，在放射科的床上，对患者进行了开胸手术。二人配合默契，忙而不乱，成功地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救回。从此，他便成了李主任的挚友，也实现了自身医术的又一次提升。

生命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其不可比拟的珍贵，而手术无疑是患者或生存或灭亡的无情判官。院领导深知这一点，每年都要求外科医生到各名医院学习、观摩，请专家到本院办讲座、做示范，王国新对这种机会十分珍惜，孜孜以求地吸收来自各位名医、专家的营养。中国医学科学院汪良骏教授，人称国家级“食管王”，在指导观察他的一次手术后，端详了王国新修长的双手良久，称赞曰：“真是把手术做得精细到家了，真是天生的一副拿手术刀的手啊！”并笑着告诫他：“可不要喝酒哟，尤其不要喝白酒，那是要破坏你这双手的。”

在医学科学面前，实践同样需要理论的指导。扎

实的理论基础，始终是一个医学专家的支撑。王国新深知其重要性，从未间断过学科的科研工作，从不停顿在医学这个世界里由自在到自由脚步。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几年内主持并完成省、市科委课题8项，参与6项；获山东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临沂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6项；出版专著2部，获专利1项；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他个人先后被推选为山东省临床胸外科医师协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胸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山东省胸心外科学会委员，山东省微创外科学会委员，临沂市胸心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临沂市抗癌协会理事等等，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胸外科专业学科带头人。

磨砺，成了一把锋利手术刀的无言的诠释。

## 为了挽留的切除

刀的基本用途是切与割，手术刀亦如此。从王国新在市人民医院率先开展的手术名称，即可见一斑：肺癌全隆突切除术，胸骨部分劈开上断食管癌切除术，主动脉楔形切除食管癌根治术，部分左心房切除肺癌根治术，同种异体胸骨移植术……

然而，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切除”却包含着更多的含义。手术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对象是人的肉体，紧密相连的是一个人的性命，是一家人乃至几家人的心。一刀下去，无不重于泰山，无不是对良知和人性的拷问。说到底，对病灶的“切除”是为了对生命的“挽留”。王国新所在的胸外科，每年进行的胸外科大手术达到500余台次，是全省市级医院最高的。即便在如此繁重的任务面前，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坚持术前两次交谈，一次对患者，一次对家属，遇有问题还要反复多次，让患者及亲属最充分地了解病情，缓解压力，理解方案，配合治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医生对患者，每天见一次好呢，还是见五次好呢？我看还是见五次好。

有效的沟通，并不能代替精密的准备。每次手术前，他都要反复思考，调动大脑中所有积累的知识，推想出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排列出各种应急措施。同时，每次都要认真会诊，集中大家的智慧，确保万无一失。在治疗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手术方面，他带领全科医护人员，不断研究，积极探索，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套路：术前充分药物准备，术中彻底切除所有胸腺组织及前纵隔脂肪组织，术后保留鼻腔插管，及时准时应用呼吸机，术后半年坚持药物治疗，等等。在全部30例手术病例中，成功率达到95%。对70岁以上高龄肺癌、食





管癌病人，大胆减少手术创伤，缩短手术时间，加强术后循环、呼吸系统管理，早期营养支持，效果显著，最大手术年龄83岁，成功率达到98%。

一个95%，一个98%，似乎并没有尽善尽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权威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统计的以下数字：肺叶切除死亡率5.5%，全肺切除术死亡率9%，肺癌手术死亡率4%，而肺癌手术近期并发症发生率达到平均34%！在生命周期与病魔灾难面前，人类奋起抗争，经常充当胜利者，却不会成为常胜将军。

对病灶的切除只是手段，挽留生命才是终极目标，其间每一名病人都是一个不重复的提问，当然也没有重复的答案。一次，王国新收治了一位年仅18岁的女孩，因外伤支气管部分撕裂，按通常规律应切除部分肺叶，但他充分考虑到年轻人的未来和旺盛的生命力，打破常规，小心翼翼地进行了缝合，结果保住这位小姑娘的肺，保住了她的健康的明天。每到一台手术成功之时，他总是感到欣慰，有一种完成一件艺术品之后的成就感，但他却从不为此陶醉，总会再看一遍那段话，一段不知看了多少遍的内科专家张孝骞的话：

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病人把宝贵的生命交给医生，医务人员在工作中稍有粗心大意，就有可能致病人伤残，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医务工作者不能有半点马虎和轻率。

### 为了至爱的割舍

到今年春节，王国新已有16个春节是在病房中度过的。

他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夫人在同一医院工作，是病理科主任，一个知名的专家。孩子聪慧伶俐，在以优异成绩声名远播的临沂一中，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他爱妻子，爱孩子，回家后总是不由自主流露出好丈夫和慈父的一面，但是为了病人，他却时常割舍哪怕是节假日的家人团聚时间。他觉得，这与他对他家人的至爱，一点也不矛盾。

有一年的除夕，他一家老小刚吃完年夜饭，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透着喜庆，春节联欢晚会即将开始，突然接到沂南县人民医院的求救电话。一贯敬业的夫人也犯嘀咕，这大过年的，有什么急事？而他却解释道，越是这种时候的求救，越说明情况的危急。然后没有任何犹豫便驱车前往。原来，这个医院在当天的一台胸外科手术中，患者意外地出现了张力性气胸，他到达后，立即实施了开胸切管处理，挽救了病人生命。到了年初二，按临沂风俗是携全家拜见岳父母的日子，他又因沂水县

中心医院的一台手术意外被请去，成功处理后，已是晚上，返程中遇到大雾，90多公里路程跑了接近5个小时，回到家已是下半夜。夫人说，你看这春节过的。他说，这世上又多了两个本过不去年的人过了年，也值。

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职业，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水滴石穿般地孕育着人的情愫。2000年，王国新夫妇已经成为医疗界的知名人士，医德和医术被口口相传，吸引了外界许多人的目光。一次偶然的机会，解放军二炮总医院的领导了解了他们，力图通过引进人才方式吸收他们“加盟”，待遇为科内业务领导，文职副团级，孩子同时转到北京读书。这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的医术将会更广阔的平台施展并得到持续提高，尤其是孩子，其成绩在北京的高考分教较低的情况下，考取北大、清华几乎铁定。他们不能说毫不动心，去与留的抗争不可避免。他们思衬再三，反复讨论，竟回顾起在临沂20年的从医生涯，从院领导的关心支持到同事的亲密情谊，从一个个病人期盼的目光到一草一木的熟悉亲切，他们渐渐感到这个话题并不轻松。最后，这对夫妇共同的心声是，要对得住良心，留下了。爱，此时被放大了，无声无息地在这片老区的土地上悄悄弥漫。

### 为了使命的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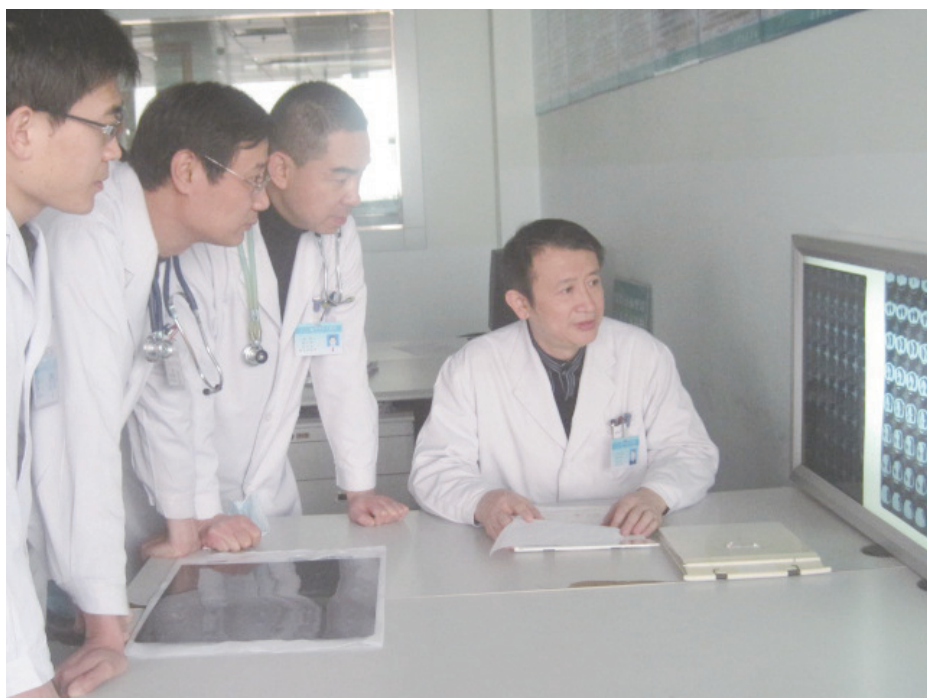
1999年开始，王国新被任命为临沂市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对这一安排，他从不认为是一个什么“领导”，甚至也不是什么级别的职务，而是对全市胸外科事业发展重任的一种担当。他油然而产生一种使命感，时时感到这副担子沉甸甸的份量，唯有努力工作，才会使肩头有些许的舒缓。他和同事们负责起全市各县区医院胸外科业务指导及业务培训，定期去下级医院指导帮助手术，解决术中难题，负起全市胸外科疑难病会诊的责任，还承担着全市胸外科医疗事故鉴定和法医鉴定。他个人被临沂市医学会聘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被临沂市人民检察院聘为医学顾问。

身临其境，须在其位谋其政。怎样才能干好这个主任，是他边干边思考的严肃问题。得出的结论只有非常朴素，非常简单的两条，但是他却有着绝非浅薄的理解。一条是要为大家着想，为大家着想就是为事业着想；另一条是善待别人，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病人，善待千百万沂蒙山区的父老乡亲——这种理念的延伸，在他看来是毫无疑问的。

转眼间他已年过半百，年轻时的奋斗经历却鲜活明了，恍若眼前。在科里的年轻人身上，他时常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于是便放手培养，但放手却不放眼。他能

准确地把握每位年轻大夫的医术水平，对其长处和不足了如指掌，因此可以相当准确地为他们安排学习锻炼机会。年轻大夫在这个科室上手术的机会很多，但都有王国新一双眼睛在不远处紧紧地盯着。一个年轻大夫为一名病人做食管囊肿切除手术，食管断裂后出现缝合困难，还没来得及求援，王主任已进入了手术室，镇定地进行了缝合处理。手术成功了，年轻医生也进步了。这是他的屡试不爽的一种工作方式，却付出很多代价：他本来承担主刀手术是最多的，又是临时上阵帮助别人处理疑难问题最多的。他是科室的正职，却是全科“随时听命”最多的人。医院同事评价：王国新是全院最放手的主任之一，而所在科室是手术操作最规范、从不出现任何差错的科室，在以手术为主的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领域达到先进水平，各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被山东省卫生厅授予“全省医疗质量安全示范科室”称号。其病房被授予“全省护理示范病房”。对一个团队来说，让大家“多干事”，又要“不出事”，还要“干好事”的状态，多少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但在他这里得到了体现。

我们隐约感到那条看不见的锁链的存在，隐约触摸到这条锁链中由信仰、责任、奋斗、至爱、奉献等等构成的环节——尽管，这些在目前社会中尚显稀缺。





# 沂蒙山飞出的“九凤”——卢卓婕

高雪萍



卢卓婕，莒南县人，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曾出演过《家有九凤》、《重庆谍战》、《大浴女》、《八千湘女上天山》、《新时代警察》、《门第》等多部影视剧，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她的演技和敬业精神得到同组演员和导演的高度认可，同时也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从《家有九凤》中的初九凤到《大浴女》中的尹小跳，从《重庆谍战》里的地下党员俞春晓到《八千湘女上天山》的龚细妹，从《新时代警察》中性子直率的民警刘春燕到《门第》中泼辣、独立的女裁缝李翠红。卢卓婕一直在尝试不同的角色，她认为戏路越宽越好，生活越平实越好。

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卢卓婕说自己是一名幸运儿，不管是当初考学，还是后来的学艺道路，一直有“贵人”相助。老乡郭晓冬，也是她在北影96级的师哥，给了卢卓婕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我觉得我能走到今天，包括以后漫长的艺术道路，我一定要感谢晓冬哥哥，没有他就没有今天艺术道路上的我。”

在2003年夏天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卢卓婕遇上了杨亚洲导演，得以出演电视剧《家有九凤》中的九凤。《家有九凤》是一部以情动人的戏。里面没有一个大奸大恶的坏人，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人，而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是拥有真情的人，他们活得纯粹，活得真实。剧中荒诞和夸张的情节还原之后还是真实，而那樣的真实的源头依然是真情。卢卓婕说起九凤，总是泪光盈盈，她为九凤而感动：“九凤是一个不关心世俗生活的人，是一个有自己梦想的女孩，她执着而干净，对社会敏锐而叛逆，这也正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戏份虽少，但人们记住了初九凤。

有了与杨亚洲导演的初次合作，2005年，拍摄《大浴女》，卢卓婕扮演女一号尹小跳。“有一种人爱得特别深，有一种人特别地不会爱。”这是《大浴女》中的一句旁白。尹小跳就是这样一个不会爱的人，陈在是一个爱上她的人。从她才12岁就开始爱她，爱她所有的不体面所有的缺点，爱她脸





《重庆谍战》剧照

上的忧伤、心底的荆棘，爱和她一起度过的成长岁月，岁月里埋藏的所有秘密和罪恶。尹小跳的“恶”只有陈在才能理解，才能包容，才能化解。他们的爱成为文学作品所能提供给我们最唯美、最有深度、超越“占有与得到”外在形式的内在永恒。尹小跳和陈在是否能在一起不再重要，他们找到一种比爱还要长久还要深刻的连接方式——惦念。如果说尹小跳面对在自己成长过程中褪去光环的大作家方兢，散去罪恶迷雾成为一个普通母亲的章妩，终于完成自我的寻找和救赎；那么对陈在的爱，她从无意识地错过，到坚硬疼痛地确认，到最后平静地舍弃，尹小跳终于找到了一个坚持与妥协、热情与理智，合理的配方。这部寒气逼人的电视连续剧讲述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爱的折磨，爱的洗礼，爱的救赎。正如胡适先生所言：“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忍受痛苦。”

《重庆谍战》是卢卓婕“改头换面”之作。长达30集的《重庆谍战》描绘了抗战时期国共特工人员精诚合作与日伪特务斗智斗勇，一举摧毁日军间谍网，挫败倭寇阴谋的动人传奇。该剧堪称是特工版的“无间道”，从始至终贯穿着扑朔迷离的情节，可谓是悬念迭起、处处玄机，引领观众在不断的兴奋和惊叹中，受到情感的震撼和灵魂的洗礼。剧中人更是一个个有着多重身份，令人难辨忠奸，不识庐山真面目，而这些人之间为了各自使命的明争暗斗，使得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此前卢卓婕扮演的都是平凡又普通的女子，而在《重庆谍战》里出演的却是一个巾帼英雄，一个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女人。卢卓婕扮演的俞春晓常常是穿着军装出现，言语间显示着自己的无情，试图用表面上的冷漠压制自己内心的热情，对于事情理智冷静，对人对己有时过于苛责，但当得知秦敖是汪伪间谍的时候，她不惜为心爱的人摆下毒酒，抛弃个人的幸福。卢卓婕用精湛的演技把俞春晓的角色特质把握得很精准，既刻画了一个女人用自己的生命拥抱爱情、拥抱正义的渴望，又彰显出一个女中豪杰对国家无限忠诚的热爱。卢卓婕之所以能把俞春晓演绎得恰到好处，拿捏得十分到位，是因为她没有脸谱化地单纯来表现角色，而是通过对人物性格、人物心理和矛盾冲突内在逻辑的准确把握，创造性地诠释了这个女性间谍的角色。

剧中有一场戏，卢卓婕发挥非常出色。就是当俞春晓发觉秦敖是敌特的时候，为了让心爱的男人不暴露汉奸的身份，带着骂名死去，她毅然选择去给秦敖投毒，自己和他同赴黄泉。卢卓婕曾透露：“我之前就想要不要哭，后来一琢磨觉得不能哭，必须从容、淡定，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得让观众看出来，我就在端酒杯的时候表情上稍



《新时代警察》剧照

有变化。”而正是这样精湛的细节表演，卢卓婕把俞春晓深明民族大义又对爱情忠贞无比的双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而纵观整部剧集，卢卓婕的表演十分具有爆发力，非常善于用少之又少的细微动作将人物的内心剧烈波动表现出来。《重庆谍战》使得卢卓婕的戏路进一步被拓宽。

《新时代警察》是一部讲述四名80后年轻警察成长历程的励志轻喜剧。剧中通过一系列事业、感情、家庭的事件展现了新时代民警的真实生活，其中卢卓婕饰演的80后民警刘春燕性子直率，敢爱敢恨，在剧中对同一个派出所的同事暗生情愫，展开热情追求，但却并未收到理想中的爱情，落得独自伤心。卢卓婕在博客中调侃道：“戏里我爱他‘爱到骨头里’，戏外他是小我四届的正宗师弟。”戏里与演员姚文婷上演情敌戏码，戏外却是感情极好的师姐妹，她说：“生活和演戏是两码事，我希望自己能够简简单单生活，认认真真演戏。”剧组由于外景原因经常需要更换拍摄场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搬了四次家，不停地收拾东西对于演员来说很是麻烦，而卢卓婕把这种麻烦当做生活的一个乐趣：“我收拾东西的速度被锻炼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井井有条！最重要的是，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拍一个戏搬四次家的机会了，这也是剧组生活的一个生动小插曲嘛！”《新时代警察》中多场夏天的戏份是在冬季拍摄，导演一喊准备，演员就脱下暖和的棉衣，轻装上阵。大连的冬季寒风瑟瑟，但卢卓婕等一众演员仍然坚持，敬业精神得到了剧组所有人员的认可。

电视剧《门第》以市井小民与都市白领间因门第观念引发的婚姻故事为线索，上演了一场艰苦的年代感情戏。卢卓婕在剧中跨年龄出演佟大为的嫂子李翠红，一个外表时尚、前卫，内心却敏感、顾家的女人。“她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虽然看上去风风火火很强势的样子，但其实还是很传统和爱家人的。”卢卓婕坦言有很多女人都是这般逞强，但骨子里都是善良的：“比如有人给她儿子送个贵点的礼物，她也会体恤到生活的不容易，而选择拿发票去商场退掉。”“丁导是很认真拍戏的那种，每个镜头和细节都会反复琢磨，跟他合作演员能学到特别多”，卢卓婕表示自己在片场很愿意当个学生，通过观察来学习前辈的表演。

一路走来，卢卓婕在坎坷中不断进步，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我们相信，从沂蒙山区飞出的“九凤”，在她的演艺道路上，必将真正成为演艺界一只耀眼的凤凰。

● 《临沂年鉴2012》荣获第四届全省优秀年鉴综合奖项特等奖第一名。2012年12月19日，省政府办公厅发文通报第四届全省优秀年鉴评奖结果，《临沂年鉴2012》获全省优秀年鉴综合奖项特等奖第一名；沂水年鉴、兰山年鉴获综合奖项特等奖；莒南年鉴、临沭年鉴获综合奖项二等奖和框架设计奖项特等奖。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务锋，副市长赵爱华分别批示表示祝贺。张务锋批示：“再接再厉，争取更大成绩与光荣。”赵爱华批示：“史志办近年来多项成果获奖，为保存我市地方史志文献，开展方志研究、收集、整理市情资料等做出了突出贡献，感谢你们，祝贺你们！望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 费县召开第二轮县志编修工作推进会。2012年12月11日，费县召开了第二轮县志编修工作推进会。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明确编修工作时间任务，进一步加快工作进度。按照统一要求，2013年上半年完成各项专志初稿并报县史志办。同时强调，各部门要加强保障，配备专门人员、办公场所、办公设备，保障编修工作顺利开展；要强化质量意识，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打造精品二轮志书。会上对主要撰稿人进行了修志编纂业务培训，对二轮县志编纂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和要求。

了修志编纂业务培训，对二轮县志编纂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和要求。

● 苍山县史志办赴枣庄峰城学习交流。2012年12月19日，苍山县史志办主任陈永亮一行赴枣庄市峰城区史志办参访学习。参访期间，两地同志就志鉴工作服务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史志队伍自身建设、营造良好志鉴编写环境、志鉴资料收集整理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地同志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联系与交流，更好地推动史志工作发展。

● 莒南县史志办学习传达十八大会议精神。2012年11月23日，莒南县史志办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认真学习传达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精神以及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要求结合史志工作实际，抓紧完成《莒南县志》、《莒南年鉴》、《莒南县大事记》修改和特等英雄曹玉海纪念馆的布展工作。

● 临沭县史志办认真贯彻十八大精神。2012年11月22日下午，临沭县史志办组织专题学习会，传达全县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学习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精神传达提纲，并结合具体实际，进一步明确今后工作思路。

## 征稿启事

为了挖掘、弘扬沂蒙优秀历史文化，推动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本刊现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稿件。

### 一、征稿内容：

凡研究、记述、介绍沂蒙历史文化的均可（可参考本刊所设栏目），体现临沂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历史，富有时代感。

### 二、征稿要求：

1、稿件要求文字精练准确，语言形象生动、活泼，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沂蒙历史文化内涵。稿件可长可短，文风严谨准确，简洁精练，朴实流畅。稿件最好图文并茂，文体形式不限。

2、文章要求尊重史实，严禁杜撰，必须是未经公开刊发的。

3、稿件一般要求采用电子文稿的方式投送，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

4、稿件一经采用，将给予一定的稿酬，未经采用的稿件不做退稿处理。

### 三、联系方式：

电子信箱：yimengshizhi@163.com

稿件邮寄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北城新区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编：276000

电话：0539-8727560

《沂蒙史志》编辑部

2013年1月